

19

1967.3

1970.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九册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九册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九七〇年五月)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一部供研究用的多卷本综合文献集。选稿的范围：（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语、电报、讲话提纲、书信、批注、诗词、题词、修改的文件中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等；（二）经本人审定过的讲话、报告、谈话记录和新闻稿等；（三）非本人起草但经本人审定并用本人名义发出的其他文稿。未经本人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

这部文献集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共十三册。这次公开出版，新增了一些文稿，并对原有文稿的注释作了修订，对部分文稿作了补注，订正了个别文稿的时间差错，全书共二十册。

这部文献集的编排：（一）以写作或发表的时间为序；（二）不能确定具体日期的，按照文稿的月份放在同月合适的位置或最后；（三）对在同一背景下论述同一主题的部分文稿，作了集纳，并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编入这部文献集的文稿，在本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按发表稿刊印；本人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按手稿或其他原件刊印。每篇文稿末尾，均注明刊印根据。文稿中的错字、漏字，分别在〈〉号和〔〕号内校正，衍字加□号。文稿没有标点的，

由编者加了标点；对文稿原有的标点作了规范。文稿中的廿、卅，均规范为二十、三十。文稿中需要说明的史实，加注释补述。文稿原来没有标题或原有标题不适合本书体例的，由编者拟写或改写了标题。编者认为内容较重要的文稿，其标题在目录中用黑体字排印。

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注释排在文稿的篇末，每条注释的详略根据理解正文的需要而定。正文中涉及的来文、来电、来信及其他文件，通常都作了注释，少数未能查到原件者付阙。

根据这部文献集的实际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几册中，每册附有韵目代日表和地支代月代时表。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九七一年三月） （1）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批语、批注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20）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23）

关于宜宾问题应加以处理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 （25）

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28）

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30）

对《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34）

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35）

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六日） （36）

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四月） （41）

关于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45)

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47)

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材料的批语和批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49)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大多数
(一九六七年) (52)

对反映关于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看法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 (53)

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
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六日、七日) (54)

对关于《矛盾论》中一段引文翻译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 (58)

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
电报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60)

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的情况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62)

关于发表《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
左派的?》材料等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64)

对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
周年宣传工作意见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 (66)

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	(68)
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	
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70)
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月)	(72)
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来信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	(75)
对北京市革委会重要通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	(77)
为中共中央等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	
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和所作批注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79)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82)
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87)
对江西省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	
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89)
关于江青不宜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91)
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	
报告起草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92)
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94)

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95）
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97）
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管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99）
老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	（101）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和支工情况报告等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月）	（102）
对反映西安几所高校造反派讲阔气、讲排场等问题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105）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一九六七年）	（107）
对周恩来关于处理江西武斗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	（108）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十三日）	（109）
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七日）	（111）
对两种《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十二月六日）	（113）
毛泽东等悼念阮志清逝世的唁电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117）
对总参、总政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118）

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的批语 和批注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119)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九月)	(121)
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127)
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 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130)
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132)
关于《毛泽东选集》正文中的一些人名在翻译时不宜 删改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134)
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七日)	(136)
对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138)
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139)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 训练班的意见》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141)
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月)	(143)
对《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147)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	(148)

对《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150)
对戚本禹检讨信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152)
对《关于抓紧搞好秋收、秋种、秋耕的通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154)
对《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155)
对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记录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一日)	(156)
对山东省革委会拟在本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等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	(159)
对《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160)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	(161)
对林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164)
对《关于在全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的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	(166)
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和《出版说明》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	(169)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	（171）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	（172）
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央复电稿的修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173）
对聂荣臻《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177）
给李志芬的题词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178）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	（179）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	（182）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183）
关于转发《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184）
对一份反映党员近期思想动态的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186）
对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187）

关于转发云南省各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情况简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189）
关于转发《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的批语 和批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191）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193）
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94）
对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 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196）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99）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一九六七年）	（202）
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203）
对《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205）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206）
对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全面胜利》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08）
对成立江西省革委会的新闻稿和社论稿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210）

对北京大学一学生反映《伍豪启事》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212）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	（214）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一九六八年）	（215）
对周恩来等关于采取措施制止破坏铁路问题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二月）	（216）
对转发江西省军区教育部队经验批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	（218）
对《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	
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二月）	（220）
对陈伯达关于发展电子工业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二月）	（222）
对欧阳毅的妻子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	（224）
对十三名在京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中央办的	
学习班学习事宜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三月）	（225）
对香港《大公报》文章《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227）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革命委员会好》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229）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一九六八年）	（232）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234)

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236)

对聂荣臻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 (238)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文字
（一九六八年） (240)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241)

对追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命令稿等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四月） (244)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乘胜前进》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246)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一九六八年） (247)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 (248)

同林彪等人的一段谈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 (249)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250)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 (251)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一段谈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 (253)

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254)
机关工作人员要学点生产知识 (一九六八年五月)	(256)
对《外国专家情况反映》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	(257)
对两报一刊七一社论稿《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 作风》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六月)	(258)
对“七三”布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	(259)
对国务院业务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的简报》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	(260)
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一段谈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262)
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 布告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	(263)
对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江华等人的请示和送审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	(265)
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 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七月)	(266)
对“七二四”布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	(268)

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269）

对关于新疆学习班各界代表活动情况的一批材料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271）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 （273）

对解放军报社《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等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274）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276）

在《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 （279）

对解放军报社两个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280）

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
（一九六八年） （282）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 （283）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八月） （285）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团结对敌》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287）

对姚文元《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 斗、批、改》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八月)	(289)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 到底》稿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	(297)
对《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材料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299)
对《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的批语 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301)
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303)
为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 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和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304)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 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307)
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 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和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309)
对信访摘报关于召开拥军谈心会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	(312)
对北京市召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 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	(313)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315)
对提前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七卷的建议信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	(316)
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317)
对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九月)	(319)
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九月)	(321)
对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队员大会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324)
对姚文元关于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问题调查会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325)
毛泽东等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的复电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327)
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准备工作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	(331)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332)

对《解放军报》社论《大兴党的三大作风》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334）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335）
对林彪在国庆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和批注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337）
给周世钊的信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339）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 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月）	（341）
对两报一刊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	（344）
对《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	（345）
对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员名单等问题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	（346）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的两段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347）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348）
《红旗》杂志社论引用的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的 两段话 （一九六八年）	（349）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 （351）

祝贺霍查六十寿辰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356）

对《人民日报》发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
和编者按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月） （358）

对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草案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月） （360）

论述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一段话
（一九六八年） （362）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363）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364）

对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问题的请示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 （365）

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366）

在反映慕中岳编著中国历代战史的《要信摘报》上
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367）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369）

对北京军区党委关于贯彻执行“要节约闹革命”指示
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372）

对《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 （374）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 （376）

在中央军委一份复电稿上的批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379）

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380）

对国防科委关于发射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381）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382）

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84）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和编者按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386）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 （388）

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意见
（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 （389）

关于不要批判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391）

在讨论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一月） （393）

在一封提议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摘报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一月） （394）

对中央转发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395）

对周恩来等关于中共九大准备工作的报告和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 （396）

关于陈奇涵宜提名作中共九大代表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二月） （398）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一九六九年） （399）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一九六九年） （400）

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只能是自掘坟墓》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 （401）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总结经验》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三月） （402）

要认真总结经验
（一九六九年） （403）

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月） （404）

在周恩来关于中共九大准备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413）

对提议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414）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416）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一九六九年） （424）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
（一九六九年） （425）

对陈伯达在中共九大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四月） （426）

**对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情况综合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 （427）

对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基层干部的要求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428）

**对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预选等情况的
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429）

对中央军委和军委办事组组成人员名单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430）

关于抓好典型和面上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九年四月） （431）

对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432）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433）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三日、一九七〇年二月） （442）

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 （444）

关于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政策材料的指示稿 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	(445)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447)
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六月)	(449)
对中央、国家机关机构精简方案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	(451)
对《关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几条规定》 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七月)	(453)
对军委办事组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报告 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454)
对中央“七二三”布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455)
对两报一刊纪念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二周年社论稿 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七月)	(457)
对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 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459)
对中央关于进一步稳定边疆局势的命令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八月)	(461)
对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请示信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464)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	（465）
为献给胡志明的花圈写挽词	
（一九六九年九月）	（467）
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稿	
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九年九月）	（468）
对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稿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九月）	（470）
对《周恩来总理致柯西金的信》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	（47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第十一稿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472）
对周恩来给柯西金复信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声明》第十五稿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	（473）
对周恩来关于发表中苏即将举行边界谈判公报的请示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	（475）
对李六如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476）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77）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	
的电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480）
对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	
报告的通知的批语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482）

对《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一月）	（484）
对外交部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指示电和中方代表	
发言稿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一月）	（486）
关于江青不必担任北京五七艺术学校名誉校长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一月）	（487）
在康生转陈垣来信的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一月）	（489）
对参加尼泊尔王太子婚礼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一月）	（490）
对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一月）	（491）
同意印发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二月四日）	（492）
对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二月）	（494）
对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的通知》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二月）	（495）
关于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三月）	（496）
对设立国务院文化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	（497）
对周恩来关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四日）	（499）
关于修改宪法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三月）	（501）

在关于迎接西哈努克到中国访问和处理柬埔寨国内 发生政变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日)	(502)
关于中美会谈日期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504)
对《中央工作会议纪要》等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505)
对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通知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三月)	(506)
为献给斯特朗的花圈写挽词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	(508)
对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文章《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 帝国主义》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509)
对周恩来在朝方欢迎宴会上讲话稿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	(514)
关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	(516)
对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517)
对关于散发西哈努克谴责尼克松声明请示 报告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五月三日)	(518)
对《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五月)	(520)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521)

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五月） （524）

对转发北京二七机车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
情况报告的指示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五月） （526）

对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的批语
（一九七〇年五月） （527）

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 工作的一组批示^{〔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九七一年三月）

一九六七年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和外事工作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现将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军委办事组、中联部和外交部等文电上的一部分重要批示和修改，汇总于后。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2〕}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3〕}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桑穆加塔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4〕}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四）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姚文元^{〔5〕}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对安斋等同志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说：首先我向同志们（安斋库治^{〔6〕}等同志）转告一个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向安斋库治等同志问候；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我在这里把毛主席批示的原文念一下。毛主席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就是指的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所写的那篇著名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主席在第一节第二段中完整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起义的经验。在那一段的最后有这样的话：“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所说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就是

指这篇文章中的整个这一段话。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7〕}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8〕}，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加写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9〕}，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10〕}上批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此事我已说了多次。”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11〕}。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

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12〕}（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十一）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13〕}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14〕}

（十四）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五）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他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了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六）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15〕}

（十七）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16〕}上的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社论的有关段落如下（毛主席删掉的地方，下边画了粗线；增加的地方，在下边打了加重号）：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赠了亲笔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今天是这一光辉题词的六周年纪念，本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不仅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产生无

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教导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件事，生动地比作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从而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条原则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日本和一切国家的革命。这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那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宫本^[17]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借口日本“国内外条件”不同，标榜什么“独立自主”，其实都是鬼话。他们在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所起劲地攻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竭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所谓“和平革命”，推行所谓“议会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背叛革命，反对革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日本革命事业的可耻叛徒。

今天，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日本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大造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日本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真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运用到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从日本的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日本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日本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相信，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真正的革命党，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18〕

送审稿的第十一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九）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19〕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20〕。”

（二十一）一九六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21〕上批示：“可用。略有修改。”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将“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二十二）一九六九年六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22〕}，批示：“可发。”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二十三）某拉丁美洲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从一九六九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先后给我党中央和林彪^{〔23〕}同志四次来信，承认过去追随苏修反华是错误的，要求同我“恢复两党关系”。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联部抄印来信的文件上批示：“林彪同志：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请转康生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二十四）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

“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六）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七）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八）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在外交部起草的给日本社会党成田知己^{〔24〕}的复信稿上，作了修改。原复信稿中说，“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25〕}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

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中的“更应”两字圈掉了，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二十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三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26〕

（三十一）一九七一年二月，旅游局在《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一九七一年拟接收外国人来华旅行八百至一千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主席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三十二）一九七一年二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27〕同志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

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提这两段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对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对此，毛主席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三十三）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28〕}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29〕}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文件刊印。

注 释

〔1〕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本组毛泽东的批示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八日印发的会议文件之六。文中用宋体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文件时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曾将本篇五至十、十三、十四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并在通知中指出：“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对对外宣传工作，作了极为重要而严肃的批示。现将毛主席的多次批示，印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党、政、军、群革命领导干部和外事工作干部中进行传

达。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理解，坚决执行。一定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肯定成绩，纠正缺点，总结经验，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更广泛深入，更切合实际，更科学，更有效。”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本册中，周恩来的主要职务未发生变化时不再作注。

〔3〕一封信，指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在中国访问后回国时在机场谈话和回国后发表的文章中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说：这“完全不是故意的”。“如果你能够找个时间去会见康生同志或刘宁一同志，准确地解释一下产生这个错误的情况，我不胜感激”。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理部长。

〔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的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说，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在学习“人民战争”问题时，发表了如下观点：（一）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中，曾经谈到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以及这些国家的武装斗争问题。如果说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就是说毛主席这段话过时了，要加以修正。对于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应以毛主席的这段话作基础来理解，即这里所说的普遍意义，不包括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二）在工人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里，应首先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三）在日本，城市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不是薄弱环节。（四）目前在日本是进行武装

斗争的教育和组织准备阶段，不是实行武装斗争的阶段，也不是进行武装起义的时机。（五）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从中国回日本的同志，都说日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一些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六）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

〔5〕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6〕安斋库治，原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7〕请示报告，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关于援越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鉴于援越飞机要在我国使用一段时间，建议和我空军使用的飞机一样，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上毛主席像章。改装训练结束后，原样移交给越方。

〔8〕指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稿。

〔9〕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印发的文件中原文如此。

〔10〕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关于答复威尔科克斯对中国外宣工作批评意见的请示报告说：一九六七年三月，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来访时，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批评，认为我们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主要原因是没有调查研究宣传对象，报道的事实和背景没有交待清楚，文字冗长累赘，形容词太多，译文质量差，外国人不易理解和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

中央主席希尔转达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甚至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希尔是反对威尔科克斯的意见的。他认为，威尔科克斯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而不仅是宣传形式问题。问题的中心是对毛主席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作何评价。他认为，为了宣传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就不能不十分强烈地、始终一贯地、反复地进行宣传，这样做对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对西方世界，是非常必需的。康生等在报告中说，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主要答复了三点：（一）愿意倾听兄弟党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二）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我们是非常克制的，不但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克制得过分了，群众有不少意见。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和宣传上，我们完全同意希尔的意见。（三）在宣传形式和语言方面，我们的工作是一些缺点和问题的。改进对外宣传工作，需有一个时间和过程。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11〕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稿的批示全文是：“有修改。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12〕请示报告，指康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要求中国公开发表其纪念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声明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缅甸共产党的声明，要求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不便给他们改，他们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是兄弟党中央的文件，他们在国内都讲毛泽东思想，如果要求他们改，可能发生误会，不登也不好，请主席指示，是否可以登载。毛泽东对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除本篇十中所引用的一段外，在文中“一般

地说”之前，还有一句：“这些材料，请你们酌定，我不看了。”三月二十九日，这个声明照原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3〕一个文件，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关于请毛泽东接见本系统专业会议代表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毛主席接见。毛泽东审阅时，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画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这个批语除本篇十二中所引用的一句外，紧接着还有一句：“此事请康老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批评，应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14〕之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在转发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的指示中指出：“外国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国际革命运动的影响的材料，可由新华社刊登在内部《参考资料》上。”

〔15〕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请示报告说：我援外军事人员现在仍称“军事专家”，“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军援外人员身份不相称。我们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工作组”，其人员按行政职务和工作性质，分别称组长、教员和翻译。如有“首

席专家”，则改称工作组组长，下辖各军事工作小组。本篇十六中的第一个批语，毛泽东写在七月八日这个报告上。八月六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再次给毛泽东等写报告，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组”。本篇十六中第二个批语写在八月六日这个报告的信封上。在这个信封上，毛泽东还写有“林副主席、总理再阅”一句。本篇十六中第三个批语写在军委办事组八月六日这个报告上。

〔16〕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修改后的社论稿《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在《人民日报》发表。

〔17〕宫本，即宫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8〕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送审的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共三十条）时，删去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写了这个批语。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的批示，已经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中传阅了”。“现在的办法，第一是遵照主席的指示去掉这个口号，即将中央通知发出。第二是可否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这个通知而仍保留第十一条，以适应和配合这次国庆的宣传”。毛泽东审阅这封信时，又批示：“去掉十一条为好”。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通知中，标语口号共二十九条，删去了送审稿中的第十一条。

〔19〕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在《人民日报》发表。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20〕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以《一篇绝妙的

反面教材，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为题，全文刊登了尼克松一月二十日的就职演说。

〔21〕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指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送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这是为答复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而起草的。中国政府声明内容共分六个部分：（一）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挑起的。（二）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三）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四）苏联政府破坏边界现状，挑起边境冲突。（五）到处扩张领土的是苏联政府。（六）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这个声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2〕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社论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发表。

〔23〕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4〕成田知巳，当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

〔25〕浅沼，即浅沼稻次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一九五九年三月，率社会党友好使节团访华，在北京政协礼堂发表演讲，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引起日本各界极大反响。一九六〇年三月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同年十月十二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堂召开的三党党首讲演会上讲演时被刺身亡。

〔26〕一九七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曾将这个批语作为《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八个重要文件》之三印发。

〔27〕朱德，一九七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本册中，朱德的主要职务未发生变化时不再作注。

〔28〕一九七〇年三月，以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朗诺为首的柬埔寨右派集团发动反对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政变，同年十月成立所谓的“高棉共和国”。朗诺，当时任“高棉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

〔29〕周恩来还在关于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锦标赛的请示报告中说：此次出国比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也是我向日本反动派发出的一次动员日本群众发展中日友好的示威。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败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中国乒乓球队后来参加了这届世乒赛，并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的批语、批注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

戚本禹同志：

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2〕}，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写几句。^{〔3〕}

三

是翘还是饶，请查一下。^{〔4〕}

四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戚本禹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五稿上的批语。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第五稿的批注。本篇四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第五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戚本禹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这篇文章第一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章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之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转载。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五稿的修改，除本篇四外，还在第二页删去“毛主席”前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外，还有个别文字修改。

〔3〕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五稿有一处引用了关于义和团流传的一首歌谣：“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得欢，一个心，杀洋官。”在这句旁边，毛泽东写了这个批注。根据毛泽东的批注，戚本禹在这首歌谣的前后各加写了一段文字。加写的前一段文字是：“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惊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加写的后一段文字是：“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瘵，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4〕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五稿中有一处写道：“影片还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大臣赵舒饶之口说：‘请老佛爷降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扫灭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国运，就在此一举。’”毛泽东在文中“赵舒饶”的“饶”字下画了一道，并写了这个批注。后经核实，“赵舒饶”应为毛泽东指出的“赵舒翘”。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 的决定》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送审的《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上的批语。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向油田所属各生产指挥部、各重点单位、各重要居民区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管。（二）油田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接管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油田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三）油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勇挑革命和生产

两副重担。现在尚在外地串连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四）要迅速健全和改组各级生产业务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活动，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五）驻油田的外地师生和外单位职工，应立即回本校、本单位闹革命。（六）大庆油田半工半读的学生，都要回原生产单位或本校复课闹革命。要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以学为主。（七）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教育、团结他们。（八）职工家属应努力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这个决定。

关于宜宾问题应加以处理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

—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七日二时

二

林彪同志：

此件请一阅。此事不仅牵涉宜宾一处，而且涉及成都军区及若干军分区对群众组织所采取的政策。你阅后，请送聂荣臻^{〔4〕}同志一阅，然后还我。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已阅，退总理。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上的批语。简报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摘要刊载了四川省宜宾县田禾三月十四日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两派冲突激烈情况的来信。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陈伯达、康生、江青三月二十七日来信上的批语。陈伯达等在信中说：“主席三月二十七日关于宜宾问题应加以处理的批示，我们已报告总理，立即遵照办理。”“宜宾问题，我们接触较早。二十天前，我们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并有几个附件，送给了总理。现在送上一份，供主席参考。”本篇三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三月二十八日来信上的批语。周恩来在信中说：“主席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已看到。当由康生、王力、关锋三同志约刘结挺等同志商谈、议定双方各来十数人，包括军区甘渭汉、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在内。”四月一日至四日，周恩来连续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强调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去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什么“黑司令”、“黑（军）分区”，不要这样说。各群众组织要开门整风。整风首先是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关锋，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曾任中共四川宜宾地委第二书记。

〔2〕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四政治委员。

〔3〕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4〕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情况调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王力、关锋同志：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九日

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2〕}的同志们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王力、关锋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的报告上。报告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我们过去调查不够，揭露不够，批判不够。似应在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揭露和批判。一些典型材料，似可发给党内领导同志看看。”这篇以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名义写的调查报告，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及清华大学原校系领导人。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调查报告中点到的刘少奇的名字，对点到的其他人，只保留姓，将名一律改为“××”，并把标题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原标题加上时间作为副标题《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之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转载。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2〕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 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一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2〕}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3〕}，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 泽 东

三月三十日下午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处应引几句列宁的原话。^{〔4〕}

三

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目、属、种，故此句可删。^{〔5〕}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6〕}

五

因为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有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7〕}，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送审的他三月二十日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对这个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播放林彪这个

讲话录音的通知。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林彪的这个讲话。

〔2〕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3〕几处修改，除本篇四、五外，毛泽东对林彪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还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包括：在第十六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二十八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

〔4〕林彪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第二页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在这句之后，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林彪讲话中在此处加写了以下两段文字：（一）“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二）“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

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

〔5〕林彪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第四页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这句，并写了这个批语。

〔6〕林彪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中，这段文字原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斯大林所不能比的，更不用说什么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头头，那就更不能比了。”

〔7〕林彪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中，这句原为“所有的地方都修了”。

对《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王力同志：

看过，照发。

毛 泽 东

三月三十日下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王力送审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上。评论员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之后《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转载。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 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1〕}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决定共五条，其中第二条讲到：“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这段文字末尾，毛泽东加写了这段文字。四月一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决定。

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 的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六日）

—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2〕}，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

毛 泽 东

四月四日

二

林彪同志：

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3〕}

毛 泽 东

四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4〕}

四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对林彪四月二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四月六日对林彪四月五日送审的这个命令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毛泽东对林彪四月二日送审的这个命令稿中第一条、第六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实查明的反动组织”一句，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一般的概

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十个字。此外，还有个别文字修改。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错误定性为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后又被错误地指责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即被打倒。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凭借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逝世。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复查结果，“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议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

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遭受错误批判并被打倒。一九七三年三月复出工作，一九七六年四月再次被打倒，一九七七年七月再次复出工作。

〔3〕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十条命令是：（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

等等。(七) 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八) 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十) 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命令中提到的赵永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六七年二月，“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将青海省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并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二月二十三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赵永夫是当时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指出：“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军区内部发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4〕林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送审的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稿中，这句原为：“对未向我开枪的群众，无论革命的、反动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四月）

—

退江青。

可以，照办。^{〔2〕}

毛 泽 东

四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看过，删了一点。^{〔3〕}

三

主席说，这篇文章^{〔4〕}，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

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送审的她四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江青在送审报告中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本篇二是毛泽东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的这个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毛泽东对江青四月十七日送审的这个讲话修改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2〕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送审的她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主要是：（一）在第五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蓍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内容上的补充和文字修改。（二）在第七页，江青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

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一语。（三）在第九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九个字。（四）在第十一页，删去江青所讲的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四人名字前的“反革命分子”的定性词。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周扬，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齐燕铭，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文化部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均被打倒。

〔3〕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送审的她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修改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有以下几处：（一）将第四页“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二）删去第六页“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九个字。（三）在第七页，江青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四）在第九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说：“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

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五）在第九页，江青讲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六）在第十页，江青讲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七）在第十三页，江青说：“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八）在第十四页，江青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十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的小的文字修改和内容增删。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4〕这篇文章，指《战国策》中的《触誓说赵太后》一文。

关于印发四川省释放 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 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2〕}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林、周^{〔3〕}阅后办。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四月二十日给陈伯达、康生等关于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的报告上。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军委扩大会议，指正在举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3〕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

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 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3〕}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4〕}，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5〕}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上。

〔2〕 恩来，即周恩来。

〔3〕 陈再道、钟汉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

令员、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4〕 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5〕 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纪登奎、戴苏理，当时均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 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 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

林彪、恩来^{〔2〕}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3〕}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注

三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

亡，后被救活者。——毛注

四

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注

五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九四〇号刊登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上的批语。本篇二至五是毛泽东对这个材料的批注。材料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革命派、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二。）部队负责人“欢迎和感谢同学们诚

恳、善意、坦率的批评”，并“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议论中，“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在“李世英同学”五个字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其中，第七条意见是：“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这条意见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四。）第八条意见是：“在作好各院校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在这条意见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五。）部队负责人认为，“李世英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召集西工大等四校负责人，就如何紧紧把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2〕恩来，即周恩来。

〔3〕军委扩大会，指正在举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 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大多数

（一九六七年）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1〕}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
第六期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并在第一版单独发表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反映关于湖南文化大革命 形势看法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

林、周^{〔2〕}同志阅。退徐业夫^{〔3〕}。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司令员龙书金^{〔4〕}有动摇，可以争取。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

毛 泽 东

五月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抄件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阅看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编印的两期《快报》刊登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后的批语。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

〔2〕 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

〔3〕 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4〕 龙书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

对《〈修养〉的要害 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 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六日、七日）

一

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四日

改后应送小组^{〔2〕}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

二

退文革小组^{〔3〕}。

在第七页，加了几句话^{〔4〕}，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
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毛 泽 东

五月六日

三

照此发表。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下午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四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五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5〕}，有陶潜的《桃花源记》^{〔6〕}，有康有为的《大同书》^{〔7〕}，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
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由王力和关锋起草、经陈伯达修改后，作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和五月八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曾多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是毛泽东五月四日对五月二日第一次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五月六日对五月五日第二次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五月七日对本日第三次送审稿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五月四日、六日先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送审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他五月六日加写的文字插入五月四日加写的文字中和文尾。本篇五是毛泽东五月六日在五月五日第二次送审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修养》，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这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并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一次，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和内容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这本著作，同刘少奇一起受到错误的批判。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2〕〔3〕小组、文革小组，均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加了几句话，见本篇五。

〔5〕《礼运》是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儒家思想及礼仪著作选集《礼记》中的一篇，其中所讲的“大同”是指一种“天下为公”的理

想社会。

〔6〕陶潜，即陶渊明，东晋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祸乱的“世外桃源”。

〔7〕康有为，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他的《大同书》将《礼运》中的“大同”说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大同”思想，认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对关于《矛盾论》中 一段引文翻译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

如何处理，请康、王、关^{〔2〕}三同志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王力、关锋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转报的张香山四月二十四日《关于处理〈矛盾论〉引用恩格斯一段话的报告》和艾德勒四月二十二日关于恩格斯这段话的翻译问题给张香山的信的批语。张香山四月二十四日给王力、关锋的报告说：主席《矛盾论》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这段话没有引全，因此主席用了删节号。我们原来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时，照主席引文译出。但这次在北京出版再译本时，英方认为这样有问题，译者给补全了。这样，如果中英文对读，就会发现中英文不符。为避免这一问题，我们建议应照主席引用的文字翻译，不必补足。但外文出版局专家艾德勒来信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样处理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并说恩格斯的这段话原是指矛盾

的特殊性，而不是指矛盾的普遍性。艾的理解可能是正确的。问题是主席引用这段话，乃是为了说明矛盾的普遍性的，因此即使引全了，也还不能解决艾所说的问題。对此应如何处理，请你们批示。在后来出版的英文再译本中，是按恩格斯这段话的全文翻译的。如照此译成中文，应为：“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463页——编者注）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成员。关锋，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张香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

〔2〕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王，指王力。关，指关锋。

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 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 的电报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1〕}各同志：

此件^{〔2〕}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五十四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3〕}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4〕}诸同志共同商处。

毛泽东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恩来，即周恩来。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2〕此件，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给济南军区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3〕“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造反组织。

〔4〕梁、张、甘、韦，分别指梁兴初、张国华、甘渭汉、韦杰，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第四政治委员、副司令员。

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 集训的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林彪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2〕}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关于支左干部集训的情况报告》上。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一千七百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十天，第二期八天），并通过集训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一）

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中央军委转发到团级以上党委。

〔2〕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

关于发表《在北师大搞军训的 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 材料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文革小组^{〔2〕}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3〕}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4〕}，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〇期刊登的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材料上。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军训期间，“坚决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

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和巩固了左派队伍”。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材料，同时还配发了题为《军政训练好》的社论。

〔2〕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3〕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公社负责人，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一九七〇年六月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四月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一九八一年因患癌症被保外就医。一九八二年六月被免于起诉。李庆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另一群众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负责人。

〔4〕四川那个文件，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对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宣传工作意见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

退陈伯达同志：

提碰头会^{〔2〕}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毛 泽 东

五月九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上。意见稿建议，五月份的宣传工作以《讲话》为中心，组织演出、宣传、纪念活动。具体内容如下：（一）各报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自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以来毛主席有关文学艺术的重要指示。（二）发表纪念《讲话》的社论和文章，有重点地组织几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并组

织工农兵群众座谈。（三）发表并出版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和其他的革命文艺创作。组织革命文艺工作者写些学习《讲话》的心得体会，大力宣传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四）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和江青一九六四年在全国革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五）五月二十三日召开纪念《讲话》的群众大会。（六）五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庆祝活动，演出革命样板戏和革命电影，并广泛开展群众性业余文艺演出活动。（七）将一批毒草影片拿出放映，供批判之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

一

此件送总理^{〔2〕}阅后，交文革小组^{〔3〕}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毛 泽 东

五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4〕}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刘伯承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转报的四

月二十九日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来信的批语。刘伯承当时在济南养病。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刘伯承在请叶剑英等转报这封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昨二十九日晚二十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一九六七年五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七〇年六月被免去军职，一九七一年三月被撤销党政职务。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4〕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 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毛 泽 东

五月十一日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刊登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上。材料说，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二）反

映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王效禹有“错误议论”。（三）反映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的问题。（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一九六七年五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七〇年六月被免去军职，一九七一年三月被撤销党政职务。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2〕恩来，即周恩来。

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 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月）

—

照办。

毛 泽 东

五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二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洗^{〔3〕}、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4〕}，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毛 泽 东

五月十四日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毛 泽 东

七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意见说：“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本篇二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十二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电报上的批语。电报说：兰州地区当前的文化革命形势仍然是大好的，一些左派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编者注），这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表态支持“红三司”，因此“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我们认为，应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委会。军区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红三司”。请速指示。本篇三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中央文革小组七月二十九日转发《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的通知和纪要的批语。这个纪要是根据毛泽东五月十四日批示，将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等二十多名负责人和胡继宗召到北京，就甘肃问题进行座谈后产生的。纪要指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2〕 恩来，即周恩来。

〔3〕 张、冼，指张达志、冼恒汉。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

〔4〕 三司，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简称。本篇注〔1〕简称“红三司”。

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 来信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

—

印《快报》^{〔2〕}，文革^{〔3〕}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毛 泽 东

五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支左人员

秦厚德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并转毛泽东等的信的批语。本篇一写在信的抬头处。毛泽东为印发这封信加写了标题《济南军队一同志来信》，并写了日期“（四月二十一日）”。本篇二写在信的末尾处。信中说：我于三月四日参加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二月十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五）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革命派告状的地方。秦厚德，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通信总站干部，一九六六年九月被免职后安排转业，因地方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未被接收。一九六七年三月参加济南军区司令部的支左工作。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快报》，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

〔3〕文革，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对北京市革委会重要通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

照办。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送审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的批语。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通过的这个通告的主要内容是：（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指示。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

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六) 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五月十四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这个通告。

为中共中央等转发广东省军管会、 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 起草的批语和所作批注^{〔1〕}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 共 中 央

中 央 军 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毛泽东手稿)

二

恩来^{〔2〕}、林彪、中央碰头会阅发。

三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工作报告、湖南省军区委员会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本篇二、三分别是毛泽东对这两个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广东省军管会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

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广州军区的《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2〕 恩来，即周恩来。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的 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

即送王力^{〔2〕}同志。

改了一点，请小组^{〔3〕}酌定。

毛 泽 东

五月十八日上午二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

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4〕}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三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送审《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的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末尾加写的一段文字。《伟大的历史文件》，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分别在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2〕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3〕小组，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托洛茨基，苏俄和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首领。一九一七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五月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撤销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党籍。一九二九年二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三二年被取消苏联国籍。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身亡。季诺维也夫，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首领。一九〇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二五年春组织党内“新反对派”，一九二六年七月又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同年

十二月被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党籍。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处决。加米涅夫，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首领。一九〇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研究院院长等职。一九二五年和季诺维也夫组织党内“新反对派”。一九三四年因基洛夫被刺事件被捕。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处决。拉狄克，早年参加波兰、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九一七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山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党籍，一九二九年恢复党籍。一九三六年又因布哈林案被捕，再次被开除党籍，并于一九三七年一月被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三九年在流放中病故。布哈林，苏联早期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一九〇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真理报》主编等职。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一月，先后被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职务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三七年二月被开除党籍。一九三八年三月被判处死刑。李可夫，一八九八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三七年二月被开除党籍。一九三八年三月被判处死刑。

附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名称变化情况简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由列宁一八九八年三月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九〇三年七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发生分裂，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称布尔什维克，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称孟什维克。一九一二年一月，第

六次党代表大会将孟什维克清除出党。一九一七年八月，改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三月，改名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改名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一九五二年十月，改称苏联共产党。一九九一年“八一九事件”后，苏联共产党解散。

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 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林彪、恩来^{〔2〕}同志，并告文革小组^{〔3〕}：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五月十日在同“广州工联”八位造反派代表座谈的讲话摘要（题为《检查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上。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2〕 恩来，即周恩来。

〔3〕 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对江西省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 情绪为何愈演愈烈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林彪、恩来^{〔2〕}同志，文革小组^{〔3〕}阅后，交汪东兴^{〔4〕}阅。
退徐业夫^{〔5〕}。

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编印的《快报》第二二一三号刊登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材料上。材料认为，江西省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是因为存在下列几点严重分歧：（一）军区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刘瑞森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军区支持的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刘瑞森，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

〔2〕 恩来，即周恩来。

〔3〕 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4〕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5〕 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关于江青不宜参加 中缅两党会谈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关于我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的请示》报告上。请示报告说：为进行上述两党会谈，我们建议，我党由总理、伯达或江青、康生、宁一、毅敏、王力同志组成代表团。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宁一，即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理部长。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 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中 央 军 委

五月二十七日

二

林彪、恩来^{〔2〕}同志阅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一九六

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2〕 恩来，即周恩来。

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 抄家一事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二）刊登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抱走财物》材料上。材料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二十二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 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试行草案）》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上的批语。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昨（二十七）日常委碰头会上通过这一决定（试行草案），现送上，请予审批。”决定（试行草案）指出：“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

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任命×××为军管会主任或军管小组长，×××、×××为副主任或副组长。”“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产的新高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个决定当天发出后，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成立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实行统一领导。

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林彪、恩来^{〔2〕}同志，文革各同志^{〔3〕}：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翻译室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2〕 恩来，即周恩来。

〔3〕 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 军管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

照办。

—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听取周恩来关于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管不能再拖的汇报后，分别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上的批语。两个决定（试行草案）均强调：“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有关生产运输调度业务，必须服从部军管会的集中指挥。”同日，两个文件下

发。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老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1〕}

根据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发表的任立新《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一文，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并写道：“一切革命干部都要响应毛主席的这个伟大号召。”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 和支工情况报告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月）

—

退汪东兴同志酌办。

毛 泽 东

六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一）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三

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汪东兴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编者注）分期分批参加支工的报告上的批语。六月二十六日，八三四一部队支工部队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本篇二是毛泽东在支工部队临行前所作的三点指示。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的来信和八三四一部队报告的批语。十一月十一日，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给毛泽东的报喜信，汇报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该厂迅速地实现了大联合，促进了“三结合”，成立了革委会。十一月十三日，八三四一部队在给毛泽东的《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中说：我们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后，坚决遵照主席在我们临行前所作的三点指示进行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大力宣传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要斗私，批修”的号召，促进了该厂两派群众的大联合，组成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支工过程中，我们老老实实地做工人群众的小学生，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战斗，同他们交心，了解了很多情况，学习了很多东西。此外，

还组织医疗小组，为职工及其家属看病近两千人次。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将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的来信、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印发全国各地、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对反映西安几所高校造反派 讲阔气、讲排场等问题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文革小组^{〔2〕}各同志：

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
发时宜写一按语。

毛 泽 东

六月二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二三四期上。这期快报刊登了陕西师范大学文革筹委会景险峰等四人的来信。信中说：最近，西安有几个学校的造反派庆祝成立革命委员会，其规模之浩大、场面之豪华，实在令人惊讶。他们不是节约闹革命，而是大搞铺张浪费。西军电（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简称——编者注）、西工大（西北工业大学的简称——编者注）两校联合开庆祝大会，成立革委会，参加者达三十七万六千人，几乎是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参加人数的四倍，筹办大会花了近万元。冶院（西安冶金学院的简称——编者

注) 成立革委会，在讲排场、讲阔气方面比前者更甚。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学起了“老大哥”的样子。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若不予以纠正，是很危险的。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将这封信转发到各军区，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和群众组织。通知说：中央认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充分认识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每个同志都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必须懂得，当权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滋长和发作，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灰尘也迎面扑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高度自觉，不断地用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武器，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抵制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

〔2〕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 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一九六七年）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1〕}

根据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编者按说：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完全可以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克服的。《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社论，及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对周恩来关于处理江西武斗 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

退总理^{〔2〕}。从山东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3〕}开得
眉目后，再定为宜。

毛 泽 东

七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夜关于处理江西武斗问题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上。报告建议从山东调第二十六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委会或筹备小组。

〔2〕 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 江西会议，指周恩来为解决江西武斗问题而召集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江西赴京两派代表会议和十一日在京江西省军区干部会议。七月十三日，周恩来再次接见江西赴京两派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要求两派按“十六条”办事，停止武斗、不准打人。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 等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十三日）

一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2〕}：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事也请制止。

三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〇期刊登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期简报刊登的一则简讯的批语。这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某群众组织过去曾在北京印售未经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讲话，受到有关方面的制止。但是，他们最近又收集了毛主席的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派人赴长沙编印。希望中央制止。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七月十三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中央指示稿将毛泽东七月五日的批语（即本篇一）转发各地，指出：“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当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指示。

〔2〕恩来，即周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七日）

—

林彪、恩来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毛 泽 东

七月六日

二

退总理^{〔2〕}。

毛 泽 东

七月七日十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一九六七年七月四

日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上的批语。这期《群众来信摘抄》刊登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七月四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本篇二是毛泽东七月七日在周恩来七月六日夜的来信上的批语。信中说，“已与黄永胜通了电话，他可以调两个团、一个师部驻赣州”。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对两种《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十二月六日）

一

退陈伯达同志：

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

毛 泽 东

七月六日

二

陈伯达同志：

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2〕}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毛 泽 东

七月六日

三

陈伯达同志：

作了一点修改^{〔3〕}。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

印发。

毛 泽 东

十二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九六七年六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这本小册子分为九个部分：（一）政治挂帅；（二）阶级斗争；（三）教育目的；（四）教学革命；（五）教学内容；（六）教学方法；（七）师生关系；（八）办学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九）学校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六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将这本小册子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政治研究室编出《毛主席论教育》小册子，打算发给大家，作为正面教材，作为教学制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让大家讨论，结合调查研究，以便提出大、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初步方案，供中央考虑。”本篇二写在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十五个部分：（一）党的领导；（二）教育方针；（三）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四）教育要革命；（五）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六）群众路线；（七）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八）教学方法；（九）知识分子的改造；（十）青年；（十一）群众办学，勤俭办学；（十二）理论联系实际；（十三）论知识；（十四）破除迷信；（十五）批判继承。本篇三是对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批语。该书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共收录毛泽东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五十余条，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一九六七年

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将该书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3〕毛泽东对《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一）第九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到，“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毛泽东在文中“我这些材料”后面加括号写了一个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二）第十一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大学，是个吹鼓手”一句，改为：“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在“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一句后，加写一句：“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在“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一句后，加写“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在讲到经学时，删去以下一段文字：“如佛经，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字太多，很难读完。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金刚经》内容提要，只有几百字，比较好读。”（三）第十三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其中讲到：“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毛泽东审阅时，在这段文字之后删去以下一段文字：“《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几个星期，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

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四）第十四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以下一段文字：“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五）第十六页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审阅时，在“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段文字后，加写一句：“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除了上述几处外，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的文字修改。

毛泽东等悼念阮志清逝世的唁电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胡志明^{〔1〕}主席同志：

惊悉阮志清^{〔2〕}同志突然因病逝世，至为哀痛。阮志清同志是您的也是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好战友。他为越南的革命事业，为中越两国、两党、两军的团结战斗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但是，他的光辉的榜样和影响是永远不会消逝的，是会继续发扬光大的。务望节哀，保重您的身体健康。

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根据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2〕 阮志清，原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三岁。

对总参、总政关于建造毛泽东 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退林彪同志。

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2〕}。

毛 泽 东

七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七月一日《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关于建造主席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上。通知写道：林副主席于六月二十八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

〔2〕 已有指示，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参见本册第 110 页注〔1〕。

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 进城武斗通知稿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

照办。

二

不宜称为坏人。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送审的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的批语。通知稿主要内容是：（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四）对参加武斗

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五）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个通知稿开头一段文字修改时的批注。通知稿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写了这个批注。同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

视察华北、中南和 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

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2〕}，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

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视察华

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这是毛泽东视察这些地区时谈话要点的记录整理稿。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整理稿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2〕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不久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五年八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王明一九五六年一月去苏联，此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三月在莫斯科病故。博古，又名秦邦宪。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的中央负总的责任，期间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遵义会议后，被调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和中共七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

中共七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张闻天，一九二五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二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三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三五年二月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直至抗日战争初期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长期或较长时期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解放》周刊总负责人、马列学院院长职务。一九四五年六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九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遭受错误批判。同年九月被解除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逝世。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为张闻天平反。

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 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1〕}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

林、周、文革小组^{〔2〕}及中央各同志：

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3〕}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4〕}做工作，使他们转

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 央

七月二十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送审的关于处理七二〇事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的复电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电。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

〔3〕来电，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现将我们的公告呈上，请审查批示。武汉部队公告，指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公告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和王力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公告于七月二十六日公开张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报告说：

“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4〕“百万雄师”，是当时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

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

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2〕}。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毛泽东写在林彪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转报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上。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封信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封信。

〔2〕加了一小段，见本篇二。

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 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2〕}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3〕}的道路。

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张际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上。张际春在信中谈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素描的情况，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他对毛泽东过去有关批示的认识和理解。他说，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文化革命中有人说我反对主席恢复模特儿的指示，这不符合事实。信中最后说：“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张际春，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

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际春受到错误批判，于一九六八年九月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2〕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一九五三年九月去世。

〔3〕齐白石，画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一九五七年九月去世。

关于《毛泽东选集》正文中的一些 人名在翻译时不宜删改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有些注解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张香山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翻译《毛泽东选集》有关问题给王力、关锋的请示报告上。请示报告说：“今年一二月间《毛泽东选集》各翻译组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发现的问题，纷纷提出，要求修改或删去《选集》正文、题解、注释中出现的一些人名。经康老请示主席后，决定仍照原文翻译（当时中央同意删除刘少奇的两段话和《历史问题决议案》）。最近，我们曾请示删去‘王明同志’的‘同志’两字，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同意。”同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翻译组同志又再一次提出，是否应删去刘少奇等十二人的名

字，或把他们后面的“同志”两字删去。“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大，而且涉及到要修改正文问题，故特报告你们，请你们转报中央批示。”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成员。关锋，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康老，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不久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五年八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王明一九五六年一月去苏联，此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三月在莫斯科病故。刘少奇，见本册第37页注〔2〕中刘少奇注。

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 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七日）

一

改了一点，其余都好。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三

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

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分别对两次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这个决定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决定共四条：（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决定。

对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此件^{〔1〕}看过，照办。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指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指出：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武斗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程世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

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

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

毛 泽 东

十一日下午五时

二

退陈伯达、江青照办。

毛 泽 东

八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均写在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送审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上。文章指出：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这篇文章后来分别发表在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和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 的意见》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照办。

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

毛 泽 东

八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上。意见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办好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训练班的指示，我们设想训练目的是检查本地区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训练的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请中央负责同志讲话，请革命左派介绍斗争经验，大、中、小会议相结合，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训练步骤可配合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步骤分四批进行，每批暂定两个月，可交错进行。训练工作由林彪直接领导，陈伯达协助进行。各省的训练班都要组织一个小的领导班子，挑选一批军队的造反派和地方上的红卫兵参加工作。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八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这个文件。

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 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月）

一

文元^{〔2〕}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显得太长。究应如何，可与你的写作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日

二

姚文元同志：

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3〕}，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4〕}，在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

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5〕}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又及

三

文元同志：

已看过，除个别修改外，均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四

根据春桥同志意见，此段以删去为宜。^{〔6〕}

五

不要用黑体字，应与上下文一律。^{〔7〕}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六

这个反革命组织^{〔8〕}，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

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根据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
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原标题为《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姚文元和他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姚文元八月二十六日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三至五是毛泽东对姚文元九月三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六是毛泽东在姚文元八月二十六日送审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九月八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陶铸，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七年初，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攻击和诬陷而被打倒。他的两部著作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也因此受到错误的批判。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陶铸被迫害致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2〕文元，即姚文元。

〔3〕加了一段话，见本篇六。

〔4〕毛泽东当时在上海。

〔5〕刘，指刘少奇，见本册第37页注〔2〕中刘少奇注。

〔6〕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送审稿中原有以下一段文字：“‘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九月三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托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杨成武（当时陪同毛泽东在上海视察）转报毛泽东：姚文元批陶的文章中，有一段批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这个问题涉及总理同陆定一的争论，是否在此文中不提这个问题，请主席考虑。”之后，毛泽东在姚文元的送审稿中删去这段文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7〕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送审稿中，将毛泽东八月二十八日加写的一段文字（见本篇六）用黑体字排印。对此，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这段文字未再用黑体字排印。

〔8〕反革命组织，指当时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这个组织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此案不久即查清处理。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因为情况混乱不清，清查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对《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很好，照发。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发《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批语。文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为着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文件要求各方必须根据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制定新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以下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小将、支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双方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消灭了美国侵略者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中国人民热烈地祝贺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他们所面临的是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坚强不屈、英勇奋战，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美国侵略者陷入灭顶之灾，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

范。越南人民的胜利向全世界证明，美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完全能够被打败的。

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它还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当前，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且继续玩弄和谈阴谋，妄图挽救它的失败。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也在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力图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但是，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正如胡志明主席所指出的，越南人民“团结一致，不怕艰苦、牺牲，坚决战斗到彻底胜利”。我们相信，越南人民必将粉碎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克服各种困难，将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越南人民。

中国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是更加强大了，更有力量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中国人民决心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在一起，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

根据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 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 的命令》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总理：

已阅，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上。命令指出，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月六日通令和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

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这个命令。

对戚本禹检讨信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2〕}二同志。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戚本禹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检讨自己错误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一九六七年

八月在王力、关锋被撤职后参加《红旗》杂志编辑工作。一九六八年一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〇年七月被逮捕。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2〕关，指关锋，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指王力，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八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党籍，免于起诉。

对《关于抓紧搞好秋收、秋种、 秋耕的通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抓紧搞好秋收、秋种、秋耕的通知》的批语。通知说：全国即将进入秋收、秋种、秋耕的大忙季节。各级领导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立即对秋收、秋种、秋耕工作进行部署，协助社队及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积肥、运肥、选种、调剂种子和农机农具检修等工作，以保证秋收、秋种、秋耕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日，这个通知发出。

对《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 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 安全的通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照办。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的批语。通知说：最近，有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各种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必须立即严加制止。通知强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通令》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同日，这个通知发出。

对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记录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一日）

—

已阅，作了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这篇话讲得好，应当发下去。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

二

林彪同志：

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第二遍，又作一点小的修改，请你酌定。请转恩来、伯达、康生^{〔2〕}诸同志一阅。用中央名义写一个报头，即可发下去。^{〔3〕}

毛 泽 东

十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在林彪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的讲话记录稿上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这个讲话记录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他删去的文字，除删去多次点名批判陈再道的名字外，还在林彪讲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之后，删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一句。林彪在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二是解放军的力量。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要不垮，办法有三条：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调查研究，听取两方面意见。第三，现在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而要以是否拥护文化大革命、是否拥护毛主席作为划分的根据。搞好文

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挂帅，学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后退。陈再道，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因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到审查并被免职。

〔2〕 恩来，即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3〕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央转发这个讲话的批语指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很重要。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对山东省革委会拟在本省报刊 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等 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

内部批判，不公开点〔名〕。至于小报上点名，可不制止。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林彪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报送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一日《在本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白如冰》请示报告的批语。谭启龙，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白如冰，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文化大革命”中，二人均遭受迫害。

对《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 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 的紧急通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照办。

九月二十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上的批语。通知指出：在北京和外地串连的学生和上访人员，应根据中央多次指示精神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欢度国庆节，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联络机构从九月二十八日起一律撤销。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通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 胜利万岁》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

—

可用。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应引几段列宁的话，应多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即退陈伯达同志照办。

修改得很好^{〔2〕}。在第三页，我作了一点修改^{〔3〕}，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十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凌晨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而写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上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陈伯达九月三十日凌晨送审的这篇社论修改稿上的批语。这篇社论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修改得很好，指陈伯达根据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批示的意见（见本篇二），在九月三十日送审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上，引用了列宁以下两段论述：（一）“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

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两段论述，同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列宁选集》有文字出入——编者注）同时，还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以下一段文字：“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此外，还有四处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3〕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送审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讲的两段话：（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二）“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对其中的第二段话，毛泽东作了文字上的修改，修改后的这段话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对林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 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退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送审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上。这个讲话稿由张春桥起草，经周恩来、康生以及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他成员讨论修改而成。讲话稿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又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十月二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对《关于在全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的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

此件不用。

毛 泽 东

十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林彪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日《关于在全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的通知》稿上。通知稿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接指向所谓的“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目前全国正在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一次大决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大事。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已经揪了出来，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伺机反扑，妄图东山再起，重新登台。如果我们只夺他们行政的权、组织的权，而没有夺他们政治思想的权，那

末，我们夺到的权就不能巩固，就有重新丧失的危险，资本主义复辟随时可能出现。因此，对于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要从组织上打倒，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各个领域里的影响和流毒。这是当前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而伟大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中的“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十一个字下画了横线。通知稿还点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八人的名字，指出“这次革命大批判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一、首先把矛头指向以刘、邓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二、要彻底揭发批判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黄克诚、谭政、刘志坚等进行篡军反党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军队的代理人。”毛泽东批示后，叶群十月三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此件存，不外传。”刘少奇，见本册第37页注〔2〕中刘少奇注。邓小平，见本册第37页注〔2〕中邓小平注。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错误地定为所谓“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贺龙，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

害。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在北京逝世。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黄克诚，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谭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一九六〇年十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陷害。一九六一年一月被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室会议成员职务，并被降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二年九月被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文化大革命”中继续遭受迫害。刘志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 《刘少奇言论》报告和 《出版说明》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

林彪、恩来^{〔2〕}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3〕}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4〕}

毛 泽 东

十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报告和附送的《出版说明》的批语。报告说：“为了适应当前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需要，我们选编了批判资料——《刘少奇言论》。”关于出版单位，“有几个方案，请择定：（一）中央文革办事组；（二）中央办公厅；（三）红旗杂志社；（四）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审阅时，将报告附送的关于此书的《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了这个批语。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刘少奇，见本册第37页注〔2〕中刘少奇注。邓小平，见本册第37页注〔2〕中邓小平注。

〔2〕 恩来，即周恩来。

〔3〕 《说明》，指报告附送的《刘少奇言论》的《出版说明》。参见本篇注〔1〕。

〔4〕 《刘少奇言论》的书名，后改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共三卷。出版单位署为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并为内部发行。《出版说明》中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发出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通知还指出：“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中，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

此件看过，可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晚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信封上。社论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十月二十一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 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和中央复电稿的修改^{〔1〕}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一

中央文革各同志：

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应当这样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林彪、恩来^{〔2〕}、中央文革各同志：

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

发出。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四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 共 中 央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给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的电报上的批语。请示电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

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组织处理的党团员，有的要求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这个请示电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画横线，并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检讨报告的批语。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检讨报告说：“主席批示小组应该讨论青海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小组在二十六日讨论了，但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谨此请主席严厉批评或处分。”“附电话原稿。这个电话已经按照主席指示通知撤销。”电话是由张春桥于十月二十六日三时打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的。张春桥在电话中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本篇四是毛泽东对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当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即发出这个电报。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张春桥，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

命小组副组长。

〔2〕 恩来，即周恩来。

对聂荣臻《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聂荣臻^{〔1〕}同志：

此件^{〔2〕}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毛 泽 东

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 此件，指聂荣臻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等的《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报告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提出：（一）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合理调整改组，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干个研究院。（二）积极解决国防科研单位的试制加工力量，缩短研制周期。（三）认真做好军管工作，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调整，条件成熟一个就接管和组建一个，争取明年上半年基本上都组建起来。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聂荣臻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

给李志芬的题词^{〔1〕}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好好学习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李志芬，当时是人民大会堂服务员。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写在她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上。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 的道路前进》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

—

内件不看了。^{〔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3〕}

毛 泽 东

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毛泽东写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

编辑部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而写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三稿的信封上。本篇二毛泽东写在陈伯达、姚文元十一月三日送审的第六稿的信封上。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六期。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将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三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前送社论稿，字体太小。现送上大字本一份，请审阅。”对这次送审稿，毛泽东未作修改。

〔3〕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将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六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文章对苏修的打击，有一定作用。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这里说的“关于主席思想六条”，指送审稿中概括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共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

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送审稿中说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毛泽东审阅时，删去其中的“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十五个字，此外未再作别的文字修改。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1〕}

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方案》为题，加编者按发表了《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北京林学院取消教研室，组织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教改》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对改革考试、升留级和招生的设想》。编者按中，在“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之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文字。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 也要吐故纳新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谈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讲的一段话。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中，引用了这段话。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

关于转发《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2〕}：

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

毛 泽 东

十一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刊登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上。谈话共五个部分：（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二）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

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四）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五）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陈永贵谈话的通知稿时，删去通知稿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陈永贵的谈话。陈永贵，当时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少奇，见本册第37页注〔2〕中刘少奇注。邓小平，见本册第37页注〔2〕中邓小平注。陶铸，见本册第145页注〔1〕中陶铸注。

〔2〕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对一份反映党员近期思想 动态的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姚文元同志：

此件可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2〕}一阅。

毛 泽 东

十一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报送上海《支部生活》革委会十一月三日编印的《党团员情况》第十五期刊登的反映上海党员近期思想动态材料的报告上。报告说：“这一件材料中反映了一些最近党员的动态，所提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如何发展新党员问题的三条，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发展新党员，恐怕需要一些适合革命形势的新规定。我们当根据您的指示继续研究，并请主席批示。”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对中央《关于今冬明春 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 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九六七

年十一月八日送审的《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个指示稿中第一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的文字。他还删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并将标题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指示。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刘少奇，见本册第 37 页注〔2〕中刘少奇注。邓小平，见本册第 37 页注〔2〕中邓小平注。陶铸，见本册第 145 页注〔1〕中陶铸注。

关于转发云南省各专（州）县 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情况简报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文革小组及碰头会^{〔2〕}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上。简报说：我省各专（州）县正在贯彻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号召。一个多月来，各地部队党委、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把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加强了领导。据不完全统计，至十月底，已办和在办的各种形式学习班共三百五十六个，参加学习一万三千多人。这批学习班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

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不同程度地检查和克服了在干部问题上的“私”字。（三）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各地对学习班正在总结经验。滇南地区一些学习班总结的初步体会是：（一）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当前运动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二）必须始终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主要学习内容，带着大联合、干部问题 and 三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反复认真地学，不断加深领会，对照检查。要抓大节，抓大方向，防止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三）要掌握重点。结合实际，扎扎实实解决一两个关键问题。（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始终要应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指责别人，不强加于人。（五）加强领导。要同学员一道学习，把群众中先进萌芽的东西加以扶植培育，总结推广。

〔2〕文革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关于转发《江西省革筹小组 注意工作方法》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

姚文元^{〔2〕}同志：

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3〕}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刊登的《江西省革筹

小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批语。文章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若干决定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注意工作方法。其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在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采取了用典型带动一般的方法。（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抓群众的活思想。（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结合中心任务，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自己革命化。毛泽东在第三条经验的后一句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这篇文章。

〔2〕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3〕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修改稿上。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六期。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关于对浙大“红暴” 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林彪、恩来^{〔2〕}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3〕}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十一月编印的《快报》第五五一〇期刊登的《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材料的批语。材料说：十一月十六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

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南萍，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

〔2〕 恩来，即周恩来。

〔3〕 “百万雄师”，是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组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为“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作了平反。参见本册第128页注〔3〕。

对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 的意见的通报》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

删掉了几句。^{〔2〕}

请林彪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

二

这两句不要。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3〕}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上的批语。周恩来等在送审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月初指示，康生、文元两同志收集和阅读了各地、各单位报来意见，起草了这一通报，并经二十（日）晚小组扩大碰头会上讨论和修改通过。现送上修改后重印稿，请予审阅批示。”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通报稿时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林彪办公室十一月二十五日整理的林彪对中共中央通报稿所提修改意见的电话记录上的批语。这个中共中央通报稿汇集了中央《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下达后第一批反映的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九大”最根本的任务，以毛泽东思想建党和修改党纲党章，总结路线斗争经验和开展路线斗争教育，整顿党的组织和改革领导机构，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条件和标准，“九大”的开会时间、规模、代表产生和开会方法等几个方面。这个通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删掉了几句，指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时，在关于“九大”的最根本任务部分所作的删改。主要删去两处：（一）删去“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二）删去“‘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和好学生”四个字。此外，还有别的文字修改。主要是在关于整顿党的组织、改革领导机构部分，将“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

队伍，成为能够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一句，改为：“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3〕林彪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整理的林彪对中共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所提修改意见的电话记录说：“林彪同志电话交待：他主张把第二页第三段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中央通报稿第二页第三段的全文是：“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林彪看到的是毛泽东审改过的稿子，这一段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后面“和好学生”四个字已被毛泽东删去。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 解放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三周年伟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通过武装斗争，打败了法西斯帝国主义，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解放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自力更生的方针，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和颠覆活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措施，在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深入地开展

了革命化运动，为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新的经验。这个革命化运动，不仅对于保证阿尔巴尼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为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和人民，一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和坚持革命的外交路线，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这种反对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博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高度赞扬。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始终站在反修斗争的前列，坚决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铁托^{〔1〕}叛徒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将永远铭记阿尔巴尼亚在这场关系人类命运的反修斗争中所建立的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欧洲坚强的社会主义堡垒。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是真正的同志和战友的关系。这种关系一年比一年更加亲密、更加深厚。我们愿借此机会，向你们表示我们的信念：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前进，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一九六七年）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1〕}

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都用黑体字发表了这个指示。《人民日报》还转载了《解放军报》的社论。

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的提法等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周^{〔2〕}、中央及文革各同志^{〔3〕}：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广大群众要求在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经研究，同意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隆重庆祝活动”。特请示以下三个问题：（一）请“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并请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派人来韶山参加庆祝活动”。（二）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1）“大会名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2）“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三）“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我们除组织省报和有关宣传部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外，希望新影能派人来摄制新闻纪录片。”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的批语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报告。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

〔3〕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对《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在第三条内去掉了几个不妥当的形容词。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送审的姚文元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上。决定稿第二部分第三条中写道：“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逐步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毛泽东审阅时，删去其中的三处“无限”和两处“非常”，并写了这个批语。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这个决定。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成立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阮友寿^{〔1〕}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2〕}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阮友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2〕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对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稿 《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全面胜利》的批语^{〔1〕}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姚文元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2〕}，请你们酌定。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上。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元旦社论，已经碰头会讨论通过（谈了两次），现送上，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这篇社论在两报一刊发表。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在姚文元送审的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

胜利》上，毛泽东删去“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句中“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后一个“万寿无疆”，删去“用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语中“最高水平的”五个字。

对成立江西省革委会 的新闻稿和社论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

退姚文元同志：

两件可用。

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2〕}。

毛 泽 东

一月六日下午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送审的关于江西省革委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批语。一月七日，这两篇稿子分别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在姚文元送审的关于江西省革委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中，毛泽东删去“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毛泽东删去“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

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将社论稿里“他们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句中的“步步”两字删去。

对北京大学一学生反映 《伍豪启事》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此事早已弄清^{〔2〕}，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 泽 东

一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反映他在一九三二年的《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给毛泽东来信的摘要上。伍豪，周恩来的别名。

〔2〕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而《时事新报》、《时

报》、《申报》等报馆对于伍豪等的更正启事（照他们的章程纳广告费的），竟完全拒绝登载。这些报馆显然是利用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帝国主义工部局的庇护，而积极实行这种危害革命反对工农兵士群众，并且间接帮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民众革命的行为。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最高革命法庭根据这个理由，宣布《时事新报》、《时报》、《申报》以及一切登载所谓‘伍豪等’的启事而又拒绝登载更正启事的报馆总经理的死刑！”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江青曾把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报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为此，他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写信报送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对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还介绍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为此批示的情况。同时，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

康生^{〔2〕}同志：

此件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引起注意。请与碰头会^{〔3〕}各同志一商。

毛 泽 东

一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黑龙江省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送审的《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报告说：全省各级革委会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深挖叛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初步发现，叛徒特务的线索，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公安部门，有的混入了军事机关。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这个报告。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3〕 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一九六八年）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1〕}

根据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文字。

对周恩来等关于采取措施 制止破坏铁路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二月）

完全同意。

退总理^{〔2〕}办，并告林彪同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康生、江青、杨成武、谢富治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为报送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本日上午十一时《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反映了徐州等地铁路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指出：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在今晚提前实行。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

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对转发江西省军区教育部队经验 批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

—

送林、周^{〔2〕}再阅。加了一段^{〔3〕}，请酌定。

毛 泽 东

二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过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批示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个批示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加写在“中央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为部队改正错误、立新功创造了条件”一句后。批示稿指出：江西省军区党委“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一些在支左中曾一度犯了错误的部队，在提高认识、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到新的地区担负支左任务，经受锻炼，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收效很好”。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省军区、各军下发这个批示。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

〔3〕加了一段，见本篇二。

对《关于进一步实行 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 紧急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二月）

在第六条的一句作了修改，请酌。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上的批语。通知稿共十一条，其中第六条讲到：“在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二月底以前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否则，即由上级派军管人员或由上级革委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派人来掌握生产和业务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一条中的“二月底以前”改为“文到一个月内”。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这个紧急通知，并注明可以在一切基层单位宣读，在内部张贴。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对陈伯达关于发展 电子工业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二月）

请总理处理^{〔2〕}。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陈伯达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的报告的批语。报告说：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国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采用现代化电子技术，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质量，而且能够大大节约原材料，同时是实现毛主席历来提出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具体措施。请主席考虑，对这个问题，是否可由科学部门（国防科委主持）、计划部门和工业部门召集一个专门会议，考虑一个方案，统一部署，作出计划。二月十三日，林彪打电话给粟裕说：“陈伯达同志对发展电子工业问题很重视，军队要帮助落实这个问题。因为聂总这几天身体不大好，正住院，这件事情请粟裕同志抓一下。”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

任。粟裕，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聂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批示聂荣臻、粟裕、罗舜初：请“遵照主席和林副主席两次指示，认真办理”。罗舜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对欧阳毅的妻子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

林彪同志：

此件请你看看，是否交成武他们查明处理。^{〔2〕}

毛 泽 东

三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原副政治委员欧阳毅的妻子陈民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反映炮兵机关斗争欧阳毅的情况，说：欧阳毅同志已被关扣五个多月，最近对他的批斗更甚，搞逼供信，强加罪名，无限上纲，武斗体罚严重，人已不像样子，恳求毛主席及中央首长能急速挽救他的生命，给他以活动自由。欧阳毅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他绝不是坏人，恳请中央能详细调查他的问题。

〔2〕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林彪批示杨成武：“请遵照主席批示，认真查明处理，俟有结果盼告。”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

对十三名在京原省、市、自治区 负责人参加中央办的学习班 学习事宜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三月）

应由碰头会^{〔2〕}商定，请总理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关于将住在中直招待所的十三名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报告的信封上的批语。十七日，周恩来总理批注：“各人情况不同，应遵照主席批示，先在碰头会上认真地一个一个地讨论一下，才能进行具体安排。”这十三名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是：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辽宁省省长黄欧东、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克林、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曹祥仁、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宋侃夫、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惠农、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鲁大东、中共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

一书记朱德海、鞍山钢铁公司政治部副主任钟建平。

〔2〕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对香港《大公报》文章《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

林彪、恩来^{〔2〕}、中央文革各同志阅。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结论不一定对，还是会打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参考消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转载香港《大公报》三月十八日摘登的《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一文旁的批语。这篇文章介绍了资本主义世界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的情况，认为当前西方的金融恐慌，很有些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大

恐慌的模样了。而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和转嫁危机，通常是以战争寻找它们的出路的。文章的结论是：“从四十年前看现在的局面，说相同也相同，说不同也不同。西方经济大恐慌山雨欲来，但是，它们是否能够从大规模的战争上寻找出路，却大有疑问。这是因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屹立在东亚大陆上，成为世界灯塔，任何侵略者妄想碰上一碰，势必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而全世界的大好革命形势，尤其是美军已在越南一败涂地的事实，也使美帝国主义有所忌惮。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边吵边打，今后势将继续；但是，它们要是敢向全面战争的道路迈进，妄图借此解救危机，那么，它们彻底舒服的日子，必将更加提早来到！”在这段文字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见本篇二。

〔2〕恩来，即周恩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 《革命委员会好》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一

等几天，加以修改，即可发表。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五日

二

照发。

在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2〕}。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

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总结群众的经验以后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毛泽东写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社论稿上。陈伯达、姚文元在送审稿上写道：“送上社论一篇。其中引用了您的最新指示。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232页《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篇二。本篇二毛泽东写在陈伯达、姚文元三月二十八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姚文元在这个修改稿上写道：“这篇文章改了一下，可否即于最近发表，可以说明大好形势，可以起正面引导作用。”社论说：“现在，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在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壮丽一幕。”本篇三是毛泽东对陈伯达、姚文元三月二十八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因故《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一月至六月未出刊，七月一日恢复出刊。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

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有一点修改，即本篇三中用宋体排印的文字。其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一句，原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 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1〕}

（一九六八年）

一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二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根据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用黑体字引用了

本篇一、二这两段文字。其中第一段文字在四月一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再次发表，第二段文字又先后在三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发表。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 《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 分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总理、伯达^{〔2〕}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毛 泽 东

三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黑龙江省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等的《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上。报告总结了黑龙江省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进行的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在大专毕业生分配方向问题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使毕业生真正和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二）在毕业生思

想教育问题上，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带着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活学活用“老五篇”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最新指示，并通过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在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上，打破过去那种少数人冷冷清清坐在屋子里，大搞神秘化的分配办法，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及毕业生分配、调配工作机密的原则下，将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群众，然后用各种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四）在毕业生分配权力机构问题上，在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同时，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保证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这个报告。“老五篇”，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五篇文章。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 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退周^{〔2〕}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毛 泽 东

四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等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在讲到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处，分别点了杨成武、张平化等人的名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三月三十日在同意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这个请示报告的批示稿中，也点了张平化的名字。周恩来送审时在中央批示稿上加了一个批注：“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湖南省革筹小组代表均主张点张平化的名，可否，请主席决定。”“第五页还有两处，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这三处点的人名，并写了这个批语。周恩来等在将中央批示稿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报告送毛泽东审阅

时还写道，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听取和讨论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军、干、群代表共八人的汇报时，曾提议结合龙书金同志，并任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批示，并转发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重大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一九七四年七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彻底平反。张平化，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调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随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月，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三年三月、七月、八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一九七五年八月又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龙书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

〔2〕周，指周恩来。

对聂荣臻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

总理^{〔2〕}：

此信请在碰头会^{〔3〕}上读一下。请电话告荣臻^{〔4〕}同志：信已收到，勿听谣言，安心养病。过两天即找聂及几位老同志一谈。以上请先告林彪同志。

毛 泽 东

四月九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在聂荣臻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来信上的批语。四月七日，聂荣臻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在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就所谓杨成武“黑后台”问题同主席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恩来嘱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内容。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一九六八年三

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重大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一九七四年七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彻底平反。

〔2〕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4〕荣臻，即聂荣臻。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的一段文字

（一九六八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

根据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在“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之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文字。同日，这段文字又在《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发表。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2〕}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

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3〕}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根据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
《人民日报》刊印。

二

送林彪同志阅，并请在碰头会^{〔4〕}宣读通过，可能还有修改之处。

毛 泽 东

四月十六日下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四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周恩来四月十六日中午送审的声明修改稿上的批语。

〔2〕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牧师。一九五七年，当选美国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席。一九五八年，在美国南方发动黑人争取公民权利。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华盛顿组织集会，反对种族歧视，要求法律面前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一九六四年，迫使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其间，多次被捕。获一九六四年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三月发动“贫民进军”（亦称“黑人运动”），四月四日在途经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时，遭种族主义分子枪杀。

〔3〕毛泽东这篇声明发表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标题全称为《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八月九日，这个声明在《人民日报》发表。见本书第十七册第28—30页。

〔4〕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对追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 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 命令稿等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四月）

有点修改。^{〔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送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追授门合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的命令》稿及《门合同志英雄事迹的简要材料》的报告上的批语。门合，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四团二营副教导员。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在巴仓农场执行支左任务，用炸药装置土火箭驱云防雹，当炸药发生意外爆炸时，为保护在场的其他二十七人免受伤害，用身体扑在炸药上，英勇牺牲。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这个命令。

〔2〕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追授门合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的命令》稿和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送审报告的修改：一是将命令稿正文中两处“无限忠于毛

主席”改为“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二是将送审报告中两处“忠于毛主席”改为“忠于人民忠于党”。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

《乘胜前进》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可用。请考虑，用两报一刊的名义，是否更好些。应在碰头会^{〔2〕}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晨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上。随后，这篇稿子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社论在五月一日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一九六八年）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1〕}

根据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社论。社论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

根据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了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各地党政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出席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革命职工代表和军管会负责同志，以及出席其他一些专业会议的人员。接见间歇期间，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了这句话。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同林彪等人的一段谈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1〕}

根据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的一段谈话。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 《划时代的文献》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可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晨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上的批语。这篇文章，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而写的。五月十七日，这篇文章在两报一刊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 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的经验》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2〕}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 泽 东

五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手稿）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报送的新华社五月十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二二〇期刊登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材料

上。新华社编印的这份材料上写道：“呈主席参阅。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一些政策性问题。”材料说：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革命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这个经验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参照执行。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关于加强军队 组织纪律性的一段谈话^{〔1〕}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2〕}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
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原载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在全军深入传达坚决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五月二十日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通知指出：毛泽东和林彪“五月二十日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指示，已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向全军指战员进行传达教育，这对于加强我军集中统一的领导，促进我军的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具有伟大的深远意义，对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光荣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你，指林彪。

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最后一句口号可以去掉^{〔2〕}，中间有几句自吹的话也去掉^{〔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送审的北京革命工人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北京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北京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的批语。五月二十二日，这个声明在《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毛泽东审阅时删去《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中最后一句口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中讲到：

“当今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一段中“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一句及之后的文字全部删去。

机关工作人员要学点生产知识

（一九六八年五月）

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1〕}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段话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五月同中共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谈话时讲的。摘自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转发的经毛泽东审批的《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

对《外国专家情况反映》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

同意在碰头会上讨论一次。

毛 泽 东

六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报送的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六月四日编印的《外国专家情况反映》上。情况反映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外国专家对他们的住所友谊宾馆的服务工作及没有人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有意见。有些意见确实是由于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和一些服务人员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引起的，有些是由于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不理解，有些则是对我进行攻击指责。六月七日，周恩来报送这份材料时建议：此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然后再派人向凡有外国专家的地方去做工作，对中国工作人员必须派军管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才有可能把关系搞好。

对两报一刊七一社论稿《发扬党的 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六月）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毛泽东写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社论稿《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上。社论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篇社论，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一期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七三”布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

照办。

毛 泽 东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布告的批语。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朝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这个布告七月三日发出，通称“七三”布告。

对国务院业务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度 粮食情况的简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

先念、富春同志：

此件已阅。所拟政策，望坚决实行。

毛 泽 东

七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李先念、李富春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报送国务院业务组七月五日《关于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的简报》给毛泽东的信上。简报说：一九六七年粮食喜获丰收，使农村粮食情况进一步好转，国内粮食收支相抵，节余粮食四十二亿斤，加上净进口三十一亿斤，全部用于充实库存。到今年三月末，全国粮食库存达到七百零三亿斤，是建国以来的最高库存水平。目前我国粮食形势虽然越来越好，但总的说，粮食还是很不充裕的。因此，必须紧紧依靠和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继续努力，做好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一定要坚决、全面落实主席关于粮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注意搞好

合理负担，清除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现象，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要在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生产队的粮食储备；严格控制粮食销售，进一步减少农村销量，逐步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要注意解决仓储保管问题，要实行一般分散、适当集中的保管方针，努力避免损失，以利备战、备荒、为人民。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一段谈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

根据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的一段谈话。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而写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编者按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阅，他对其中的引文作了修改。本篇是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对编者按的修改，参见本册第267页注〔1〕。

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 《宣传贯彻“七三”布告 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2〕}：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 泽 东

七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报告的批语。报告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月三日发出的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湖南驻军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各单位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收到了日益明显的效果。经过宣传，有的人主动交出武器，撤出工事，停止武斗。从实践中大家体会到，要落实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分发动群众。七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七三”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的布告。参见本册第259页注〔1〕。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对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江华等人的 请示和送审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

暂不批。

毛 泽 东

七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江华等人的请示报告和陈伯达五月二十四日起草的送审报告的批语。送审报告说：“浙江省革委会核心组来电请示，将在《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小碰头会上议过，拟予同意。”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华，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丰平，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陈伟达，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冰，原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党校校长。

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 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 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七月）

—

照发。

二

不是说不读外国书。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送审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陈伯达、姚文元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根据您的提示，我们组织新华社、《文汇报》记者就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问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加了一个编者按，引用了您的最新指示。现送上，请审阅、修改、批示！”《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引用的“最新指示”原文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篇调查报告中所说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一句后加括号写的一条批注。本篇三是毛泽东对这篇调查报告中一句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还将编者按中“奉劝少数患有近视症而还不是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一句，改为“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将调查报告中“破除框框”改为“破除不适用的框框”；将“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劳动实践经验的高初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一句，改为“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七月二十二日，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七月十二日谈话中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一段话。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七二四”布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

照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布告上的批语。布告说：最近以来，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这个布告七月二十四日发出，通称“七二四”布告。

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 《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 的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2〕}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毛 泽 东

七月二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毛泽东写在谢富治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报送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七月十六日给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

京卫戍区《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等的信封上。本篇二毛泽东写在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七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报告上。报告说：“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于六月十一日至七月六日，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的学习班，看来效果还好。现将公安局军管会的报告送上，请阅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报告说：遵照中央、中央文革指示，我们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学习班，收效很大。我们的体会是：（一）对犯罪的青年学生，很需要做争取教育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二）从政治上启发觉悟入手，以自我教育为主，开展大摆、大颂、大批、大挖的“四大”活动，是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的有效办法。（三）专政机关的一套旧的办案作风和办案路线，必须大破，非改不可。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对关于新疆学习班各界代表 活动情况的一批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建议将第一件发到广西班、徐海^{〔2〕}班、福建班、云南班及西藏班。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报送的新疆学习班联络组编印的关于新疆学习班各界代表活动情况的一批材料的第一件上。题为《“三新”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开拥军谈心会》的第一件材料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新疆“三新”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开拥军谈心会，称赞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保卫祖国、“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成绩，检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解放军的错误言论和行动，说：比如，冲击军事机关，对解放军骂、打、抓、刁难、丑化，还把同解放军关系紧张的责任推到解放军身上。听了中央和中央文革首长七月二十日在接见时的批评，才猛醒过来，认识到这是做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今后一定和解放军改善关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解放军代表表示，主要是我们犯了错误，军民关系紧张，部队要负责任。这时，新疆学习班在北京举办。

〔2〕徐海，民国时期地名。徐指徐州，海指海州。徐海，指江苏省北部徐州和连云港（原称海州）地区。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七月）

删去了几个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日给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马来亚革命者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要求在中国公开发表《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走马来亚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文的请示报告上。请示报告说：将由中联部告诉马共同志，“中国共产党一贯遵循马列主义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不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此，“你们的文章，我们不便发表”。同时，毛泽东删去请示报告中两处提到的希望马共“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问题的“毛泽东思想”一词。

对解放军报社《八、九、十月份 宣传要点》等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林彪同志阅后，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一阅。然后退还解放军报总编小组。此件^{〔1〕}可以试行，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修改计划。人民日报也要试作计划。而要有一个像样的计划，就非征求若干基本读者的意见不能成功。

毛 泽 东

八月五日下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指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小组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报送毛泽东审阅的《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七条：（一）突出宣传军队帮助革委会的巩固和发展。（二）大力宣传全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抓好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三）深入宣传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四）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五）加强对革命大批判的宣传。（六）紧密结合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宣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两周年，以及大办民兵师题词十周年。（七）加强言论，

写好社论等文章。与这份宣传要点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报社临时总编小组八月一日《征求对报纸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的意见座谈会的情况简报》。简报说：最近我们邀请了十个单位的十四位同志到报社座谈，征求他们对报社最近一个时期宣传要点的意见。今后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 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 的安排意见》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一）完全同意。（二）郑维山^{〔2〕}应参加领导小组。（三）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毛 泽 东

八月五日下午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经周恩来修改的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送审的《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上。安排意见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参照广西、广东、安徽、湖南等地的经验，我们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如下安排：（一）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十万人的

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二）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三）抓好典型。（四）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六）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安排意见中所讲的毛泽东最新指示，指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谈话要点。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都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学生的缺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不适用北京。那就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

反革命分子处理。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安排意见中所讲的两个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的布告（即广西布告，通称“七三”布告，参见本册第259页注〔1〕）和七月二十四日的布告（即陕西布告，通称“七二四”布告，参见本册第268页注〔1〕）。

〔2〕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在《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的批示》稿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

照办。

毛 泽 东

八月十日

（在常委四十人名单中漏列周兴，应补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上。《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提出：中央同意昆明军区《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报告中提出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谭甫仁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等同志任副主任。八月十四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谭甫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周兴，原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云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陈康，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司令员。

对解放军报社两个座谈会 情况简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

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毛 泽 东

八月十三日

此件请送林副主席^{〔2〕}一阅。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如恢复，此四字宜重写。^{〔3〕}

三

官僚主义问题。^{〔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对解放军报社总编室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编印的《军报生活》第二九二期刊登的《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和《海边防指战员对办好报纸的希望》两份简报的批语。本篇一写在前一份简报的第一页上。前一份简报介绍了解放军报社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邀请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就今后怎样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的问题举行座谈会；后一份简报介绍了解放军报社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邀请西藏军区、福州军区及海军一些同志，就同一主题举行座谈会的情况。

〔2〕林副主席，指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3〕《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中，有一条讲到：“希望很快恢复‘思想战线’。”在“思想战线”四个字下，毛泽东画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即本篇二。“思想战线”由毛泽东题写，这是《解放军报》原来开辟的一个栏目，后来停办了。

〔4〕《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中有两条讲到：“记者到‘三支’‘两军’前线去得少”，“到《解放军报》找人很困难”。在这两条意见下，毛泽东都画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即本篇三。“三支”“两军”，指支持左派、支援农业、支援工业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

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

（一九六八年）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1〕}

根据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社论还写道：“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完成面临的各项任务有重大的意义。”八月十四日，陈伯达、姚文元将社论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姚文元在这段话旁注明：“这段引文第一次见报。”毛泽东审阅时，对这段话作了修改，并批示：“照发。”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解决 “老大难”单位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

这个材料^{〔1〕}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毛 泽 东

八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指上海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在宣传、学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收缴武器，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的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二）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起来促头头。（三）对“老大难”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四）注意发扬“老大难”单位中的先进因素，促使其改变落后面貌。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这个报告。“七三”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

三日布告。参见本册第 259 页注〔1〕。“七二四”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布告。参见本册第 268 页注〔1〕。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 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照发。

略有修改。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本报七月二十二日编者按^{〔2〕}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多数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送审的《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社论稿上的批语。这篇社论稿是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而写的。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还将文中“挑动工农斗学生”改为“挑动群众斗群众”。八月十八日，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编者按，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所加写的编者按。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社论稿《团结对敌》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送审的社论稿《团结对敌》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送审的这

篇社论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的文字。这篇社论稿是为祝贺福建省革委会的成立而写的。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八月二十一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姚文元《在工人阶级的 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2〕}。请向碰头会^{〔3〕}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4〕}

三

大体可以了。

四

除已写明是我讲的两段话以外，其余都不用粗体。^{〔5〕}

五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六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七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九

这个“独立王国”^{〔6〕}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十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十一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

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十二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

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十三

在这个过程^{〔7〕}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十四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十五

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

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8〕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对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的《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稿的批语，并将标题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本篇三、四是毛泽东对姚文元八月二十三日送审的这篇文章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五是毛泽东对姚文元八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这篇文章修改稿的批语。本篇六至十五是毛泽东对姚文元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次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姚文元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的《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稿上写道：“根据您的‘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文中整理的毛泽东的两段讲话，见本篇十一、十四中

两段带引号的文字。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人民日报》等报纸在八月二十六日转载。

〔3〕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4〕姚文元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的《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稿上写道：“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审阅时，删去文中“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5〕姚文元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送审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稿上写道：“这是准备提交碰头会宣读的稿子。您加的一些段落，都用了粗体，以便同志们了解学习。如认为有的地方在发表时不宜用，请注明。”毛泽东在“不宜用”三字旁画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批语中所指的两段话，见本篇十一、十四中的两段带引号的文字。

〔6〕“独立王国”，指文中这之前提到的所谓“旧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

〔7〕这个过程，指文中这之前提到的“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的过程。

〔8〕引号中的文字公开发表时，是用黑体字排印的。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 《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 到底》稿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八月）

此文可用。但从十三页起的两节中读起来较沉懵，空话太多，新意太少，宜加删改。并宜接触当前政治斗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稿，共分五节。毛泽东审阅时，删去第四节中以下一段文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对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和九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毛泽东

批语中说的“从十三页起的两节”，指这篇文章的第四、五两节，发表前已作一些删改。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社负责人。

对《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 领导班子的原因》材料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

康生、文元^{〔2〕}同志：

二七工厂材料，请你们研究一下。加上北京别的工厂的材料一起，看是否可以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3〕}

三

既然车间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了核心作用，又要支部加强领导，岂不矛盾？^{〔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新华社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三八三期刊登的新华社题为《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材料上的批语。材料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现有两个厂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去年十月成立的老革委会和各车间的革委会，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是今年六月二十日重新成立的新革委会和各车间的党支部，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由于工厂两派分歧的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

〔2〕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3〕新华社《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材料说：据“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开展大批判，也没有充分吸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入党，就匆匆忙忙恢复了党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二七厂的整党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毛泽东在这两段文字下画横线，并在旁边写了这个批语。

〔4〕新华社《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材料还说：二七机车厂军管会认为，“各车间的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到核心领导作用，所以只能让党支部来加强领导。结果形成了两个中心”。在这段文字下，毛泽东画横线，并在旁边写了这个批语。

对《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 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前遵

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主席予以批示。”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个通知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的文字。通知稿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这个通知。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通知中所说“七三”布告，参见本册第259页注〔1〕；“七二四”布告，参见本册第268页注〔1〕。

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 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上。报告建议，对目前还“没有成立革委会，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长期打‘内战’，存有不少严重问题”的五十三所军队院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除派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参加外，拟从部队抽调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部分“五好战士”参加，组织强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九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并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

为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 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 《红旗》杂志编者按和批语^{〔1〕}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

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九月 日

二

拟发表的材料一篇及按语，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2〕}阅，退姚文元^{〔3〕}同志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并请总理提向碰头会^{〔4〕}上一议，加以修改。建议在《红旗》第三期上发表。

毛 泽 东

八月三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张春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报送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后，为《红旗》杂

志写的编者按。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张春桥报送的调查报告的批语。这篇调查报告说：最近，我们调查了上海工业战线工人技术人员的情况，发现有一大批工人技术人员分布在上海大、中、小工厂中，其中在数量众多的小型厂中，工人技术人员要占本单位技术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他们和广大工人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力军。这支强大的工人技术人员队伍，将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理工科大学师资队伍的主要来源。学校要进行教育革命，必须改造现有的师资队伍。上海这支工人技术人员队伍，有很高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有丰富的三大革命运动经验，懂得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此，完全可以从他们中间选拔一批优秀者来担任大学教员。最近进大学的工宣队中，就有一批工人技术人员。可以肯定，随着学校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人阶级在教育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将愈益显著。毛泽东审阅时，将调查报告讲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句中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删去；将由工人技术人员来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为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一句中的“人类历史上”五个字删去。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后来均未在《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3〕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社负责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4〕总理，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越南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坚持人民战争，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在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大搞和谈阴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中配合，力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的头号帮凶。

但是，美帝、苏修加在一起，也挽救不了美国侵略者在越

南必然失败的命运。它们互相勾结、重新瓜分世界的狂妄企图，正在遭到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美帝、苏修越是勾结在一起，世界人民就越看清楚他们是一丘之貉。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大好。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深信，久经战争考验的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只要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必将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亿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 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 教育革命》写的《红旗》杂志 编者按和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

《红旗》杂志编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

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姚文元^{〔2〕}同志：

此件仍有用，可发表。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3〕}一议。

毛 泽 东

九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后，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个调查报告的批语。调查报告说：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创办时，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余名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学习目的性明确，阶级觉悟高，学以致用，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和广大师生，在总结建校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一）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三）

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均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九月五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

〔2〕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社负责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3〕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对信访摘报关于召开拥军 谈心会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

建议将此件通报全军，普遍开谈心会。

毛 泽 东

九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整理的一份信访摘报的批语。摘报说：最近云南个旧、河北保定、四川内江、福建福安和厦门等地的群众组织来信反映，他们在八一前后邀请当地驻军开拥军“谈心会”、座谈会，会上群众组织的代表称赞了部队的功绩，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部队同志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一些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通过拥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十月四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这个信访摘报转发全军，要求凡担任“三支”、“两军”的部队，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普遍开谈心会，对持不同观点的群众诚恳对待，多作自我批评，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

对北京市召开工人、解放军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 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1〕}：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2〕}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2〕此件，指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给毛泽东等的《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报告说：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共中央

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对重要问题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与学生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而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三）在革命大联合问题上，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确是坏人的，要实行群众专政；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这个报告。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全面胜利万岁》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毛泽东写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送审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上。这篇社论，是为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写的。社论说：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九月七日，这篇社论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提前出版《毛泽东选集》 第七卷的建议信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

待商。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关于提前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七卷的建议信上的批语。信中说：《毛选》第七卷文稿拟从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起到十二中全会止，并建议请康生、江青、姚文元三人主编这一卷，争取九大以前出版。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评论员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 问题》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

问题》稿，是为配合发表毛泽东写的“《红旗》杂志《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编者按”（见本册第309、310页篇一）而写的，毛泽东审阅时将标题《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对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送审这篇评论员文章的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篇评论员文章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姚文元在报告中说：“送上第三期《红旗》杂志见报目录，请审批。评论员文章如不适用，请勾去。‘赤脚医生’一文中有一段主席重要文字，拟用粗体，附上一并请批。”姚文元在报告中所讲评论员文章，即《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赤脚医生”一文，即《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一文。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社负责人。

对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 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九月）

—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辽宁省营口市水源公社各学校的教育革命，搞得比较出色。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毛泽东写在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五九三期刊登的《人民日报》批判组的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营口市

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体会》上。毛泽东审阅时，将调查报告的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调查报告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的文字。八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在向毛泽东报送调查报告时写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改革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调查报告，署名改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社负责人。

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 “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 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九月）

—

照发。

二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2〕}

三

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3〕}

四

整个教育制度^{〔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的批语。本篇二至四是毛泽东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加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还将调查报告的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姚文元向毛泽东送审调查报告时写道：“上海送来了几份调查报告。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份较好。教育、文艺之外，卫生系统的革命也是一大问题。可否登下期《红旗》？”这篇调查报告，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社负责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2〕调查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之后，毛泽东加写了本篇二这段文字。

〔3〕调查报告中写道：另一位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

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这段文字，即本篇三。

〔4〕调查报告在对江镇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进行对比后，指出：“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六个字。

对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队员大会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太多。

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关于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队员大会请示报告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我们看了些材料，觉得似有必要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向他们打个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请主席考虑，开这样的大会，是否必要，是否及时”。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三人，拟在四个人中抽一人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的批语是对此而写的。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对姚文元关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整党建党问题调查会 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一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2〕}阅。他^{〔3〕}要回电，请用文革名义给他去一个电话，说十五日信已收到，同意他们的意见。

毛 泽 东

九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可以吧。——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报送关于

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问题调查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今天春桥同志同我到了国棉十七厂，开整党建党问题调查会。这个厂是上海一个重要的革命阵地，领导成分已有很大更新。过去七个党委委员，有四个被打倒，两个被结合，一个靠边站。现在的革委会十三个常委，有十个是党员，其中七人是从一般党员中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经过运动考验、被群众选入革委会的。因为领导核心经过补充新鲜血液，他们找的发展对象就较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要求入党的新党员由什么人批准？春桥同志和我都认为：“像这样条件的单位，经过市革委会同意，革委会中的党组织（即十三个常委中的十个党员）可以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能，有权批准新党员入党。不知可否这样试验一下，请予指示。”在这段文字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春桥，即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这时姚文元、张春桥均在上海。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3〕他，指姚文元。

毛泽东等对霍查、谢胡电贺 我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 成立革委会的复电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我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你们热情洋溢的贺电，这是对正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巨大支持。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大的敬意。

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正在开展一场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革命化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年，恩维尔·霍查同志提出的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监督，丰富了这个运动的内容，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我们最热烈地祝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越来越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使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发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前几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布退出华沙条

约^{〔1〕}的决定和法令。这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又一沉重打击，是对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巨大鼓舞。华沙条约早已成为赫鲁晓夫^{〔2〕}修正主义集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控制和掠夺东欧各国人民的工具，早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用来同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3〕}组织作交易、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工具。最近，苏修叛徒集团纠集波兰、东德^{〔4〕}、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修正主义伙伴，公然利用华沙条约的名义，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和反动性。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集团，对侵略者采取了卖国投降的政策，可耻地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其杰出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对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华沙条约从事的种种罪恶活动，久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表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原则性。

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退出华沙条约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侵略性条约组织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受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奴役和威胁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阿两国人民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建立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是经受得住严峻考验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加坚强的七亿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边。如果美

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一根毫毛，等着他们的只能是彻底的、可耻的、无可挽回的失败。

亲爱的同志们，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在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紧随美帝、苏修的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携手前进吧！

伟大的、牢不可破的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华沙条约，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国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华沙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通称。同年六月四日起生效，有效期二十年。这是苏联、东欧国家为抗衡北大西洋公约、防御帝国主义侵略而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指出，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规定设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等机构。条约生效时，正

式成立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例会，并签订《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九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一九九一年七月，华沙条约失效，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2〕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被先后解除这两个领导职务。

〔3〕北大西洋公约，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十二国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起生效。公约规定，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受到武装攻击时，其他缔约国必须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由此成立。之后，土耳其、希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北马其顿、芬兰先后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有三十一个成员国。

〔4〕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简称。

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 十二中全会准备工作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

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的批语。报告汇报了九月十五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其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参加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数，连同能出席全会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在内，约三百人左右。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在 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 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2〕}：

此件请碰头会^{〔3〕}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量办理。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上海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等的《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上。请示报告说：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吸收入党的人，必须是认真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

想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具备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向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必须坚持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批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这个报告，指出：“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党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3〕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对《解放军报》社论 《大兴党的三大作风》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看了一遍，可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江青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转报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小组九月十八日送审的《解放军报》社论《大兴党的三大作风》的批语。社论说：作风问题，对于我们巩固胜利和发展胜利，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党的三大作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革命威力，有力地保证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顺利贯彻。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青年，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健康地成长，就必须用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去克服言行不一的作风，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种种倾向、特别是山头主义的作风，用自我批评的作风去克服文过饰非的作风。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工人 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 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2〕}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上海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林彪等的《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上。报告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十个区的五百一十三所中学和一千二百四十九所小学。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全市中小学于九月十六日开学，广大师生纷纷到校。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

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此外，工宣队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目前，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在组织工宣队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同时深入调查研究，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作准备，摸索经验，树立典型，逐步推广。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这个报告。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对林彪在国庆十九周年庆祝 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

在第二页末段去掉一句。

二

这一句不要。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毛泽东写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送审的林彪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上。讲话稿第二页末段说到：“全国成千成万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或者正在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审阅时，删去末尾一句“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本篇一是对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删去这句话的批注。十月一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上讲话。十月二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给周世钊的信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惇元^{〔1〕}兄：

此信^{〔2〕}今天收读，甚慰。前两信都未见，可惜。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我不同意为个人作纪念，请告附小。对联更拙劣，不可用。就此奉复，顺祝康好！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惇元，即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2〕 此信，指周世钊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到自去年十月底从北京回到长沙后，曾于去冬今春两次上书，不知收到否？并说：“近来社会出现注释您已发表的诗词本子颇多，虽各有优点，但有的仍不免有穿凿和错误的地方。不知您曾否翻阅过。犹忆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一日晚上（当时有章士钊、程潜和王季老在座），您曾告诉我，有人在为您的诗词作比较可靠的注释。此人

的注释今天想已出来，不知是哪一种。急想得到您的指示，以便向学校的师生介绍。”又说：“第一师范附小已迁回书院”，“旧址房屋也大体恢复了您任主事时的原貌，那里负责人想将您当时作的‘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的对联重新悬挂出来，并嘱我向您请求亲书此联见寄。我们想：这不但对附小师生是极大的鼓舞，对中外来校参观者也有很大的教育作用。”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程潜，原国民党军将领。一九四九年在长沙率部起义。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一九六八年四月病逝。王季老，指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 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月）

一

姚文元同志：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2〕}上讨论决定。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可用。^{〔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刊登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姚文元十月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这篇文章而写的编者按上的批语。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一百四十一人，主要是原省市机关干部和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三千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标题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批语的主要内容。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3〕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说：毛泽东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

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对两报一刊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九月）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而写的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上的批语。社论讲到：工人阶级派出宣传队，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审阅时，删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这篇社论，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社负责人。

对《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

肖力、毛远新^{〔2〕}二人不宜参加。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毛泽东写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下午二时送审的《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上。送审稿初拟了一个一百三十三人的参会人员名单。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肖力、毛远新的名字，并写了这个批语。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组长。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对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人员名单等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

肖力不宜为工作人员。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毛泽东写在周恩来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报送的关于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员名单（草案）等问题的报告上。周恩来的报告说：“毛远新同志不参加，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改由杨春甫同志参加。林彪同志批示，亦附呈请阅。”林彪十月十日对出席十二中全会人员名单（草案）的批示是：“肖力、远新同志近两年来在工作中取得很多成绩，我原拟同意他们参加此会。鉴于主席的批示和昨晚会上主席的意见，应按主席指示执行。考虑到肖力同志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且她对《解放军报》工作有不少贡献，建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这对她是个锻炼。”针对林彪的这个批示，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组长。远新，即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开幕会上讲的两段话^{〔1〕}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一

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

二

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

根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话中的两段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引用了这两段话。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九大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 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可以发了。目录中有改变^{〔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毛泽东写在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上。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第十页上，我增加了一段您的最新指示，这是对当前运动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现送上，请审阅。”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349页篇二。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社负责人。

〔2〕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目录上，《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文排在第四篇，毛泽东审阅时，将它改为第一篇。

《红旗》杂志社论引用的 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的两段话^{〔1〕}

（一九六八年）

一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

二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
第四期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二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

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用黑体字排印的毛泽东的两段话。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和《全国革命人民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文中，再次用黑体字发表第二段文字。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 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

一

可以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2〕}，作为讨论的基础。有一点修改^{〔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已印发，让大家讨论为宜。

毛 泽 东

十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有一些修改^{〔4〕}，待议。

四

在第四页上作了一点修改^{〔5〕}，因为托洛茨基和瞿秋白也谈不断革命^{〔6〕}。

五

已阅。退康生同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六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7〕}，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七

在第七页上增加了三个字。^{〔8〕}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稿上的批语。

康生等的送审报告说：“根据主席指示和各地各单位的意见，我们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两次，我们又作了多次修改。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先送主席看看，是否基本可用？请主席审查、修改、批示。”本篇三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十月二十六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稿上的批语。周恩来等的送审报告说：“昨（二十五日）晚在小组会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十位同志对康生、春桥两同志提出的党章草案修改稿及关于党章草案的决定稿进行了讨论和修改。”“伯达、文元两同志因修改全会公报稿未参加会议，事后也取得他们同意。”本篇四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十一月二日晨四时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批语。本篇五是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上的批语。本篇六是毛泽东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改写的文字。本篇七是毛泽东在康生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上的批语。《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四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十二中全会各同志，指正在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同志。这次全会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

〔3〕有一点修改，指毛泽东对康生等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送

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稿的修改。除本篇六外，还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4〕有一些修改，指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稿的修改。（一）主要是将决定稿中的三处“毛主席”均改为“毛泽东同志”，两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二）对同时送审的章程草案，毛泽东也作了一些修改。主要删去：（1）“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一句中的“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2）“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3）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此外，还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并于十一月三日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一起印发全党。

〔5〕作了一点修改，指对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四页的修改。章程草案写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只能靠不断革命来解决”，毛泽东审阅时改为：“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

〔6〕托洛茨基，苏俄和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首领。一九一七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任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布）、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五月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撤销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党籍。一九二九年二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三二年被取消苏联国籍。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身亡。一九〇五年，托洛茨基曾提出“不断革命论”，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中共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同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7〕这句原为：“设立在无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

〔8〕《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七页原为“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必要的精干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在“设立必要的精干机构”一句中增加了三个字后，即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祝贺霍查六十寿辰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敬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您六十寿辰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衷心的、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您是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缔造者，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先进的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和您的正确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阿尔巴尼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您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深入地持续地开展革命化运动，同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恩维尔·霍查同志，您的光荣的历史证明，您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勇战士。

中阿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经过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考验的。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让我

们两党、两国人民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各国革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彻底埋葬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苏修而并肩战斗！

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新的胜利和新的成就。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祝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对《人民日报》发表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 和编者按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对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送审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黑龙江送来两篇材料，挑选了这一篇，我觉得内容、写法都较好。准备再过三四天在《人民日报》用。”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革委会、爱辉县革委会、爱辉公社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践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说：爱辉公社拉腰子、松树沟、外三道沟三个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于去年十一月开进了学校，一举夺回了农村教育大权，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们管理学校的做法是：（一）高举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坚

持一条道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三）建立一支队伍——整顿、改造、重建了农村教师队伍。（四）实行一元化的普及教育——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五）组成一个班子——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人民日报》为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写的编者按指出：“这篇报告写得很生动，有对比，有材料，有总结，使人们对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毒害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好处，有一个具体的认识。贫下中农说：现在‘学校是咱们的学校’了，这不是对教育革命最大的赞美吗？”十月二十八日，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公报草案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月）

—

印发全会各同志^{〔2〕}讨论。

二

此句此地不用为宜。^{〔3〕}

三

有一点修改。^{〔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草案上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十月三十

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草案上的批语。这个公报十月三十一日经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十一月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全会各同志，指正在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同志。这次全会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

〔3〕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草案中写道：“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一句，并写了这个批语。此外，公报草案的这一段中还讲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毛泽东审阅时，删去“唯一”二字。

〔4〕有一点修改，指毛泽东对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草案的修改。主要是删去以下文字：“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大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论述文化大革命 “必要性”的一段话

（一九六八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中，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语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十一月二日，这个公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1〕}

根据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的一句话。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1〕}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上讲的一段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用黑体字引用，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和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

对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 递交国书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关于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过去惯例是由其总统签署致我国国家主席的，现我国国家主席已缺，拟告其致我国国家副主席，不提姓名，我派出新使节，亦拟由董必武副主席签署。以后仿此（在国家体制未改变前）。

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 一份情况简报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转报一份情况简报的报告上的批语。这份情况简报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在某地“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处理的情况。

在反映慕中岳编著中国历代战史的 《要信摘报》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

送黄永胜^{〔2〕}同志酌办。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如可能，可找来看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四〇八号上。摘报说，武汉市参事室研究员慕中岳（原国民党政府军少将，起义于川西）致毛主席一信称：“他做了不少危害人民的罪行。为了对党立功赎罪，从一九五

七年起研究中国历代战史，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止，把东周晋楚城濮战役，到北宋对西夏作战镇戎战役，其间每个朝代的主要战役写成了初稿。共三十一卷，二百七十余万字。”还说：“战役初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小将搬走。现将自己所记忆的每卷情况制成表和汇编成‘中国历代战史’编著情况简介，向主席汇报。”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又写批语，即本篇二。

〔2〕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你们英雄的国家解放二十四周年光辉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四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扬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持续地开展了群众性的革命化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阶段。这个运动，大大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革命，加速了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国防，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

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坚决支持世界革命，坚持不懈地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苏修叛徒集团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你们无情地揭露了苏修的侵略面目和美苏勾结的罪恶阴谋，毅然地宣布退出苏修一手控制的、已经变为侵略性的、反社会主义的华沙条约^{〔1〕}。这一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和东欧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苏修叛徒集团。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辉，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的英雄气概表示无限的钦佩，热烈地祝贺你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亲爱的战友们！世界革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向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发动猛烈的进攻。美帝和苏修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我们坚信，中阿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切被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必将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必将推翻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胜利是一定属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国军队的伟大战斗友谊，是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经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我们再次向你们表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七亿中国人民，誓作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坚强后盾，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的反帝反修斗争。让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国军队在反对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共同斗争中，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携手前进！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华沙条约，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国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华沙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通称。同年六月四日起生效，有效期二十年。这是苏联、东欧国家为抗衡北大西洋公约、防御帝国主义侵略而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指出，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规定设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等机构。条约生效时，正式成立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例会，并签订《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九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一九九一年七月，华沙条约失效，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对北京军区党委关于贯彻执行 “要节约闹革命”指示 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可转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报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党委十月二十九日关于贯彻执行“要节约闹革命”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报告说：我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使部队进一步锤炼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发挥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勤俭节约取得了新成绩。其中今年全军区共冻结、压缩、削减经费七千三百多万元，去冬今春节约取暖用煤九万多吨，高速度、高质量地兴建了一批中小工厂。十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等报送这个报告时写道：“军委办事组讨论，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拟转发全军。”毛泽东在“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拟转发全

军”下画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十二月十四日，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同时配发两报署名题为《坚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方针》的社论。

对《人民日报》发表 《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 合作医疗制度》等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

此件照办。

另外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提出讨论。^{〔2〕}上海和北京都有些可供发表的材料。吴研因的信^{〔3〕}似也可发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报送《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两篇文章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经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报道及座谈会情况（摘要）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批示”。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湖北省宜昌地区革委会、长阳县革委会、长阳县人民武装部调查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

一文和北京《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2〕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次日，即开辟《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从十二月二日专栏第七期起，增加了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内容，开始涉及可否划归工厂和街道联办的问题。这个讨论专栏后来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共一九七期。

〔3〕吴研因的信，指吴研因题为《我对“建议”的看法》的来信。信中说：读了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来信，觉得很好，能够大大加速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我认为，大中城市的城区小学，也可以下放给工厂办，好处和大队办学差不多。十二月二日，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吴研因，教育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

一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2〕}：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 泽 东

十二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这个厂^{〔3〕}有三千工人，连家属共一万人。

三

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毛注〔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北京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新华印刷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华社记者关于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在这个经验报告上的批注。经验报告说：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对全厂已揪出的六十八名阶级敌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反复调查、反复研究、反复核实的基础上，根据阶级敌人罪恶的轻重，坦白交代的好坏和悔过自新的表现，做出恰如其分的定案处理，给予他们不同的出路”。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毛泽东的批语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揪出所谓“六十八名阶级敌人”问题，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批准的北京市委、国家出版局关于为北京新华印刷厂问题彻底平反的报告指出：“四人帮”一九六八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炮制的那个假经验文件，应予否定，强加给该厂广大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平反昭雪。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文革各同志，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成员。

〔3〕这个厂，指北京新华印刷厂。

〔4〕《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中讲到：这个厂有一位党委副书记，过去在运动中被当成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过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而这个人出身很苦，旧社会曾经要过饭，大家认为他本质上还是好的。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在各连队派代表参加的会上，他进行了检查，绝大多数同意解放他。革委会准备还在全厂范围内让他做检查”。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

在中央军委一份复电稿上的批注^{〔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关于同意核试验中使用飞机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空军的复电稿的末尾，写有“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这句口号，并写了这个批注。

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建议将此件^{〔1〕}转发各地参考。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此件，指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等的《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报告说：为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准备，军区各部队组织一千一百多个调查组下去调查。从已调查完的三十四个县三千五百九十八个社、队领导班子情况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百分之十三至十五，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调查情况表明，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支农部队应根据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这个报告。

对国防科委关于发射 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 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转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等十二月七日给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请示报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一九六八年四月批准的东风三号地地导弹试验计划，应继续用两发试验弹进行全射程飞行试验。绝大多数工人和技术人员确信可以保证总装质量，要求尽快进行飞行试验，向九大献礼。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写，应批准他们进行这次第一发东风三号试验弹的全程飞行试验。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 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站在反美斗争最前线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八年来，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发扬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人民战争，消灭了美伪军和仆从军大量有生力量，把美国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越南南方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实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打下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在越南的失败，正在大肆玩弄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进行垂死的挣扎。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帮助美帝扑灭越南人民的革命烈火，正在加紧同美帝进

行肮脏的政治交易。但是，美帝、苏修的一切阴谋诡计，在久经考验的越南人民面前，是不会得逞的。

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我们相信，三千一百万英雄的越南人民，在其伟大领袖胡志明^{〔1〕}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国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 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有一点修改，付讨论。

二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三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

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送审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上的批语。通知稿第二条写道：“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段文字，即本篇二。通知稿第四条写道：“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段文字，即本篇三。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这个通知。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 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 报道和编者按的批语^{〔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可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送审的拟由《人民日报》转发的《甘肃日报》会宁县城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388页。《甘肃日报》十二月十日发表的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一百七十八户、九百三十二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

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文字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时，这一句已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在“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之后，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此后，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 要大联合的意见^{〔1〕}

（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

一

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

二

徐州已经翻了几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

三

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四

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根据中共中央转发的文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针对江苏徐海地区革命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的情况连续作出的四条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党委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四条指示。这个报告，后作为第六十八军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附件《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送毛泽东等审阅。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第六十八军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附件。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批语时批示：“照办”。

关于不要批判所有与“二月逆流” 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

内有批语^{〔2〕}，请黄永胜^{〔3〕}同志办理。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毛 泽 东

一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报送的有关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的材料的批语。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报告的信封上。本篇二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

组的报告上。所谓“二月逆流”，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和中央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与会人员时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一九六七年初，谭震林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陈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李先念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徐向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聂荣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余秋里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2〕批语，即本篇二。

〔3〕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在讨论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 管理问题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一月）

要理解情况，就要耐心看材料。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讨论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主席批示，要我找财政、金融、商业部门的同志谈一下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并签注意见。我在十四日晚召集上述部门及相关部门的军管人员、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大联委负责人共三十多人座谈了这一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农村供销和信用两合作社下放归社、队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收购亦均通过社、队的购销服务社、站经营，国家商业只在县市城镇设立批发、收购站和国家商店。粮食、油料的购销，在农村拟晚一步下放。周恩来还向毛泽东报送了国务院值班室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关于农村商业和信用社下放问题座谈简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业务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关于供销合作社系统人员机构的基本情况（汇报材料）》和商业部军代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关于讨论〈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好（调查报告）〉的综合报告》等三份材料。

在一封提议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的来信摘报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一月）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又李讷、毛远新^{〔2〕}二人不宜为代表^{〔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报送的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的批语。摘报说：一月十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3〕 代表，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对中央转发清华大学贯彻执行 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 政策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照发。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的批语。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这个报告。

对周恩来等关于中共九大 准备工作的报告和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

一两天内谈一次。另件^{〔2〕}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报送《中央文革碰头会为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稿）》的报告上的批语。周恩来等在报告中说：昨今两晚，我们经过讨论，拟了一个为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请予审阅。请求主席、林副主席在最近一两天内约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成员开一次会，听取九大准备工作情况汇报。议程（草案）的主要内容有：九大代表集中到京的日期和开会程序，九大代表的批准问题，研究各单位对党章草案的修改意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研究和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政策问题，研究九大后的中央机构问题，关于九大的宣传方针问题。报告还附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稿）》，请毛泽东审批。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另件，指周恩来等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稿）》。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将本地区协商提名为九大代表的同志，集中到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座谈和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中央机关、各大军区、军委专属队、各军兵种，也应当举办这样的座谈会。

关于陈奇涵宜提名 作中共九大代表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二月）

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报送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关于曾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提名和未被提名作九大代表名单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关于八届中委、候补中委曾出席十二中全会、现被提出或未被提出作‘九大’代表问题，本拟在会谈中面报主席和林副主席，请作最后决定。现因会议推迟，特先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已审定的书面文件送呈一份请阅，便于主席预作考虑。”陈奇涵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原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后被选为九大代表，并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举行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一九六九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1〕}

根据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一九六九年）

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1〕}

根据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只能是 自掘坟墓》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送审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只能是自掘坟墓》上的批语。三月十一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 《总结经验》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三月）

在碰头会^{〔2〕}上讨论后再发表。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总结经验》的批语，并将标题改为《关于总结经验》。毛泽东还对这篇社论稿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主要是：（一）将“革命在前进。形势是很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改为“革命在前进。形势是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高的”，删去其中的两个“很”字。（二）将“毛主席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从理论上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群众中根本性的、有普遍意义的先进经验”一句中的“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十个字删去。（三）将“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高度的重视，认真学习，认真执行”一句，改为“毛主席这个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重视，认真学习，认真执行”。这篇社论，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合刊发表，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

〔2〕碰头会，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

要认真总结经验^{〔1〕}

（一九六九年）

—

要认真总结经验。

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
第三、四期合刊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合刊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在“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一语后，用黑体字引用了本篇一、二中的文字。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这篇社论。

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稿 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月）

一

看了一遍，写得好，只需要个别词句的修改。

二

一、四、五部分问题较少，略作修改就可以了。二、三部分问题较多，需要大修或重写，缺点是论点过多，近于集纳，可以考虑两部分合起来，把重复的删掉，不要去描述许多阶段，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也不要提。

三

看了一遍，略有修改^{〔2〕}，大体可用。觉得还应压缩，把空话和不需要的形容词尽量删去。请林彪同志酌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请林彪同志审阅。退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3〕}。

毛 泽 东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五

此件看过，另有批语^{〔4〕}已先送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六

林彪同志：

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5〕}，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6〕}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7〕}二同志。

毛 泽 东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时

七

林彪同志审阅。我看这样修改较好。只在第二十四页上作

了一点修改^{〔8〕}。新排本^{〔9〕}留下待看。此件请你阅后退还张、姚二同志。

毛 泽 东

四月七日二十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八

已阅。

九

可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10〕}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十一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11〕}。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

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二

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十三

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十四

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十五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12〕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六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关系问题。〔1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十七

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14〕。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六日送审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通常简称

“九大政治报告”或“政治报告”）草稿第一部分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三月二十一日晚送审的政治报告草稿第四、五部分（第二、三两部分已在此前送审）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三月二十五日送审的政治报告修改第一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三月二十九日在政治报告修改第二稿上的批语。本篇五是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三月二十八日晚送审的政治报告修改第二稿上的批语。本篇六是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三月三十一日晨五时半送审的政治报告修改第三稿上的批语。本篇七是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四月七日送审政治报告修改第四稿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本篇八是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四月十日送审政治报告修改稿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九是毛泽东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四月二十五日送审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文字校正稿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本篇十至十七是毛泽东对送审的历次政治报告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四月十四日，中共九大举行全体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告全文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四月二十八日，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略有修改，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送审的政治报告修改第一稿除本篇十七的修改以外，还作了以

下四处修改：（一）删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文献”中的“划时代的”和“光辉”六个字。（二）删去“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一语中的“柯西金之流”。（三）删去“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一语中的“最大的”三个字。（四）将“查清了刘少奇反革命的真面目”改为“查清了刘少奇这个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

〔3〕有一些小的修改，指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晚送审的政治报告修改第二稿的修改。除本篇十、十一外，还删去以下一段文字：“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魄，是这场革命能够发动、能够克服各种阻力、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此外，还有其他小的文字修改。

〔4〕另有批语，指毛泽东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政治报告修改第二稿上的批语。见本篇四。

〔5〕作了一些修改，指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送审的政治报告修改第三稿的修改。除本篇十二至十六外，毛泽东还删去以下一段文字：“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地开幕了。”此外，还有其他小的文字修改。这次送审的政治报告稿中的第三节与第四节，分别讲的是关于我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问题，经毛泽东调整顺序后，在公开发表时，分别为第七部分和第六部分。毛泽东改为第五节的末尾一小节，在公开发表时为报告的第八部分，标题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6〕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革委会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7〕张，指张春桥。姚，指姚文元。

〔8〕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送审的政治报告修改第四稿第二十四页上写道：“对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查出的坏人，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对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查出的坏人”一句，改为“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

〔9〕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在送审政治报告修改第四稿的请示报告中说明：“这里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把修改处注明或剪贴上去的本子，一种是修改后新排出的本子。”

〔10〕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成立，是各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破产。

〔11〕大字报，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秀、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宋硕，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珮云，曾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12〕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的文字。引号中的文字，在公开发表时都用黑体字排印。

〔13〕这是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送审的政治报告修改第三稿第三节前加写的一句。第三节后被毛泽东改为第四节，公开发表时又改为第七部分，标题为“关于我国和外国关系”。

〔14〕在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送审的政治报告修改第一稿上，这句原为“把美帝、苏修送进坟墓”。

在周恩来关于中共九大准备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照办。中委人数恐须略为扩大一些。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关于中共九大准备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在二十七日晚的碰头会上，“我提出‘九大’中委人数草案（中委一百一十五人，候补中委九十五人，共二百一十人），请大家考虑，然后再考虑具体人选或范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选出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共二百七十九人。

对提议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2〕}，请考虑酌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二十一时关于提议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海东因病长期休养。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一九六九年四月，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并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2〕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

小组顾问。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陈云，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的这六个人都进入主席团，并在主席台上就座。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2〕}，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3〕}，湖北的代表陈潭秋^{〔4〕}，湖南的代表何叔衡^{〔5〕}，上海的代表李汉俊^{〔6〕}，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7〕}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8〕}，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9〕}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10〕}。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11〕}，恩来同志、伯承同志^{〔12〕}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

秋白、李立三、王明^{〔13〕}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14〕}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15〕}呀，什么彭真、薄一波^{〔16〕}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上的讲话。本篇和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五月九日印发各地，要求“向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革命委员会委员以上，军队排以上干部宣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2〕董老，指董必武，一九二一年七月和陈潭秋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九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3〕王尽美、邓恩铭，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山东的中共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一九二五年八月因病逝世。邓恩铭一九二八年底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4〕陈潭秋，一九二一年七月和董必武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九年五月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秘密杀害。

〔5〕何叔衡，一九二一年七月和毛泽东以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赴上海途中，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时牺牲。

〔6〕李汉俊，一九二一年七月和李达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脱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愤怒声讨。同年七月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同年十二月，在湖北汉口被桂系军阀杀害。

〔7〕陈公博，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脱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曾任汪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理主席等职。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十月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四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六月被处决。周佛海，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秋脱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曾任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警政部部长等职。

一九四五年九月被国民党军统局软禁，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病死狱中。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和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抗日，十一月底到达陕北保安。一九三七年九月起，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党籍。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秋进入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八月回国后，从事托派活动并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六七年六月被捕。一九七八年底被释放。一九八六年十月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一九八七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8〕李达，一九二一年七月和李汉俊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夏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随后脱党。此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

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于一九六六年八月逝世。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湖北省委的决定，为其平反昭雪。

〔9〕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二人（另包惠僧受书记陈独秀派遣出席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二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人，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人。

〔10〕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举行，到会代表八十二人。

〔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八十四人。

〔12〕恩来，即周恩来。伯承，即刘伯承，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13〕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五大、五届一中全会上，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革命失败后，和李维汉主持召开中共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二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仍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等职。同年十月中央红军主

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李立三，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之后，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一九六七年六月逝世。一九八〇年三月，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不久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五年八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王明一九五六年一月去苏联，此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三月在莫斯科病故。

〔14〕张闻天，一九二五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二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三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三五年二月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直至抗日战争初期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长期或较长时期兼任中共中央

宣传部部长、《解放》周刊总负责人、马列学院院长职务。一九四五年六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九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同年九月被解除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逝世。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为张闻天平反。王稼祥，一九二五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二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后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四年一月逝世。

〔15〕刘少奇，见本册第37页注〔2〕中刘少奇注。

〔16〕彭真，一九二三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二九年六月被捕。一九三五年刑满出狱。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七届一中全会上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八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一九五五年七月改称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关进监狱。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薄一波，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

年后在中共顺直省委指导兵运工作。一九三一年八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任中共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九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履行简单手续集体出狱，同年十月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因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遭受迫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他们的错误结论，使他们得到平反昭雪。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一九六九年）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1〕}

根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通称“九大政治报告”或“政治报告”）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文字。这个报告四月十四日在大会上通过，四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

（一九六九年）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1〕}

根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通称“九大政治报告”或“政治报告”）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文字。这个报告四月十四日在大会上通过，四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曾经讲到：其实在第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是不是请你也考虑一下这个世界问题，战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

对陈伯达在中共九大会议上的 发言稿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四月）

第二页说得太过分，宜删去。你可以另外写一些你自己的见解。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陈伯达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送审的准备在四月十四日中共九大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发言稿的第二页写道：“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长期斗争，具有最丰富的经验，是历史上仅见的所向无敌的创造性人才。毛主席紧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在思想、理论各方面战线上，在工、农、兵运动各方面战线上，在革命战争的战场上等等，总是大无畏而又细心地工作，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我们从一个胜利到一个胜利。”“毛主席在理论工作上和实践斗争中，都是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辩证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这些文字后写了这个批语。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对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情况 综合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

可于下午四时先谈一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晨六时报送的出席中共九大的各代表团提名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情况的综合报告上的批语。综合报告说：参加九大的四十五个代表团对中委人选的提名，总数已达四百二十一人，可能到四百五十人左右。其中，第一类即八届中委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原拟提六十人，已提名六十人；第二类即革命领导干部，原拟提二十至三十人，已提名六十二人；第三类即解放军，原拟提八十人至一百人，已提名到一百九十人，尚有九个单位未计算好；第四类即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原拟提五十至六十人，已提名到一百零七人，尚有九个单位未计算好。同日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提名问题。

对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 基层干部的要求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1〕}

根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针对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基层干部讲的一句话。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社论中引用了这句话。

对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和候补中央委员预选等情况 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意下午三时半开主席团会，四时开大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关于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预选结果及本日下午九大举行正式选举和闭幕大会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昨日下午在主席团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上通过了九届中委的预选名单，即可作为正式选举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即进行大会选举。大会选举准备工作已在进行。提议在今日下午大会开会前半小时开一主席团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到会见见大家，然后进行大会选举。时间请主席决定，以在下午三时后较妥。

对中央军委和军委办事组 组成人员名单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宜加李德生^{〔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送审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给毛泽东、林彪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第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中，均加入了李德生的名字。

〔2〕李德生，当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

关于抓好典型和面上工作的指示^{〔1〕}

（一九六九年四月）

—

一定要抓好典型。

二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

根据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期间讲的两条指示。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在“毛主席在九大期间一再指出”之后，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条指示。

对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筹备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可在下午四时开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七时报送的有关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现将我们遵照指示安排的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名单呈阅，并附上昨日下午举行提名票选的结果。今日九届一中全会的开会时间拟定在下午四时或稍后，连同政治局会议约二小时半可毕。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2〕}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3〕}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

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4〕}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5〕}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

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6〕}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

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7〕}跟王效禹^{〔8〕}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9〕}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10〕}，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11〕}，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12〕}。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

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均^{〔13〕}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14〕}、杨、余、傅^{〔15〕}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和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本册第416、417页），中共中央五月九日印发各地，要求“向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革命委员会委员以上，军队排以上干部宣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2〕《共产党人》，指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

〔3〕恩来，即周恩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4〕刘少奇，见本册第37页注〔2〕中刘少奇注。

〔5〕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

〔6〕报告，指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通称“九大政治报告”或“政治报告”）。

〔7〕杨得志，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8〕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9〕许世友，当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0〕“红总”，当时江苏南京的一个群众造反组织江苏省红色

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

〔11〕“八二七”，当时江苏南京的另一个群众造反组织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简称。

〔12〕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3〕皮定均，当时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14〕王，指王力，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指关锋，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停职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人被关押。后均被开除党籍，免予起诉。戚，指戚本禹，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一九六七年八月在王力、关锋被停职后参加《红旗》杂志编辑工作。一九六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戚本禹停职审查。一九八〇年七月被逮捕。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15〕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三月，在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被关押。一九七四年七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

知》，指出这一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中央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 “五一六”问题的意见^{〔1〕}

（一九六九年五月三日、一九七〇年二月）

一

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二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分别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三日、一九七〇年二月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的问题时所作的指示。这两段话，均引自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转发的

《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曾对中央转发这个座谈会纪要批示：“同意。”“五一六”，指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这个组织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此案不久即查清处理。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因为情况混乱不清，清查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

林、周^{〔2〕}及在京政治局各同志阅。退汪^{〔3〕}存。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对邓小平五月三日致汪东兴并请转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共中央信的批语。信中说：九大开过了，不知是否已到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对此，我完全静候党的决定。我本人的最大要求是能够留在党内，使我能有机会，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执行新党章的规定，在我的余年中，努力做好党分配给我的工作，或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尽力做一点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邓小平，见本册第37页注〔2〕中邓小平注。

〔2〕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

〔3〕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办公厅警卫局局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

关于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 落实政策材料的指示稿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报送中共中央为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材料的指示稿的报告上的批语。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主席交办的这份材料，我们于五日晚宣读和讨论了一次，商定核实修改后由中央转发各地参考，并希望主要城市进行试点。中央批语稿（即指示稿——编者注）及附件现送主席审批。中央指示稿指出，这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现将这个材料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将你们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试点经验报告中央”。毛泽东审阅时，将指示稿中“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后面的“等地”两字改为“及其他大、中城市”。五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材料。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项政策的具

体做法是：（一）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二）对资本家中的极少数反动分子，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区别对待，给予出路。（三）对不够资本家的，把他们划出来，按小业主对待。（四）对小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在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中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 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六月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报送的空军党委五月四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空军部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完成较大革新项目二百三十项，正在研究的八十多项，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报告分五个方面介绍了具体情况，包括对现用歼击机的重大改进，地空导弹反干扰电路与高射炮性能的改进，反干扰性能强的机上雷达、地面雷达与通信保密技术的研制，通用化、小型化、机动化的科研工作地开展，利用废旧器材勤俭节约搞科研等。报告在开头和结尾两次将“技术革命”和“技术

革新”并用，一处说“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空前活跃”，另一处说“以革命带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工作”。毛泽东的批语，是对此而写的。

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六月）

照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的批语。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有的挥霍国家资财，不经批准，用烧瓷、石膏、塑料、金属等材料，塑造各种毛主席像；有的绘、印、绣毛主席像，不认真，不郑重，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有的制作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样式繁多，质量又差；有的随意随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这类形式主义的做法，虽则出自好意，却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二) 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 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 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 “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做适当处理。(七) 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这个文件下发。

对中央、国家机关机构 精简方案的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

原则同意。

七月三日下午六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关于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机构精简方案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在主席临行前（毛泽东五月二十九日离开北京去南方视察——编者注），曾报告过国务院业务组改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取消和精简，准备成立各单位的革委会及其领导小组等问题，并连带提出了党中央各部委如何改革的问题。当时主席指示，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党中央直属机构中仍保留中央文革（后未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编者注），以继续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教、艺术、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工作，保留办公厅、组织部、联络部等。宣传部、调查部、监察委员会等部门拟下放、合并或撤销。国务院业务组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九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

组长。李震、邱国光、刘西尧列席。国务院所属六十二个部门拟合并为二十一个单位，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计二十一万。遵照主席指示，将统战部、人大、政协、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各民主党派机关六个单位的军管负责人合并组成一个小组，由我派一人与之联系。

对《关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几条规定》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七月）

原则同意。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关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几条规定》的批语。规定指出：中央在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有将近两年时间，有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约三万二千人次参加。学习班是遵照主席的指示举办的，成绩很大，对各地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起了一定的促进和巩固作用，但也存在着缺点。今后，每省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要军、干、群三结合，特别是要有战士和基层群众；主要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解决当前各地的主要问题。七月八日，这个规定发出。

对军委办事组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 领导小组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肖力已下放，不应任此职。

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的报告的批语。报告说：“根据当前解放军报社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我们考虑，有必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对报社革命和生产实施一元化的领导。为此，解放军报社经过反复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十五名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关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我们建议仍以肖力同志为好。”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原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当时已下放到基层锻炼。

对中央“七二三”布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照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为解决山西省闹派性、搞武斗等混乱现象的布告的批语。布告说：当前，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为此，中央决定：（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他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

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这个布告所署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通称“七二三”布告。这个布告中所说的“七三”布告，参见本册第259页注〔1〕；“七二四”布告，参见本册第268页注〔1〕。

对两报一刊纪念人民解放军诞生 四十二周年社论稿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七月）

—

照发。

二

这个形容词太长，可以去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陈伯达、姚文元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社论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二周年》上的批语。毛泽东审阅时将标题删去十一个字，改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二周年》，并又写一个批语，见本篇二。八月一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社负责人。

对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用军委名义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送审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的批语。指示指出：目前全军形势大好，但“有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甚至个别中高级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为此，提出如下要求：（一）全军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二）要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提高全体人员对纪律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四）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认真贯彻严格管理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五）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紧，反

复落实。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个指示的署名由“军委办事组”改为“中央军委”。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这个指示。

对中央关于进一步稳定 边疆局势的命令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八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稳定边疆局势的命令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根据最近边疆各省、区和各地区发生的情况看来，需要继中央“七二三”布告（参见本册第455页注〔1〕——编者注）之后，再发出这样一个命令，将对稳定局势有利。中共中央命令指出：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命令你们：（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

导。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军队人员“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六）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

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向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发布这个命令（通称“八二八”命令）。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对京剧《智取威虎山》 改名等问题请示信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牵动太大，至少暂时不要改动戏名和主要人物名字，地名暂时也不宜改动。对小说作者^{〔2〕}的批评也宜从缓。

毛 泽 东

八月三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对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问题的请示信上。信中说：“我们把《智取威虎山》改名为《智取飞谷山》，因为现在才确知作者是写自己，真人真事。”“《林海雪原》的倾向主要方面也是不好的，主要表现在：不突出党的领导；不分战争的正义性质与非正义性质；侦察工作神秘化；把杨子荣写得比土匪还土匪等等。”信中还提出把“杨子荣也改名为梁志彤”。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小说作者，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近几年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人民战争，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抗击着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当前，尼克松^{〔1〕}政府正在加紧推行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企图用政治欺骗和所谓战争非美化的手法达到它永远霸占越南南方的目的。

苏修叛徒集团一贯同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赫鲁晓夫^{〔2〕}是这样，勃列日涅夫^{〔3〕}之流更

是这样。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实现其同美帝国主义称霸和重新瓜分世界的狂妄野心，最近一个时期，更加紧了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露骨地施展假支持、真出卖的阴谋，妄图把越南人民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苏修叛徒集团做尽了坏事，他们同美帝是一丘之貉，是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我们相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持久战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国土上全部赶出去。

中国人民一向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越南人民进行的这场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民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2〕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被先后解除这两个领导职务。

〔3〕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为献给胡志明的花圈写挽词

（一九六九年九月）

献给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胡志明同志^{〔1〕}

根据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河内逝世，享年七十九岁。九月三日晚，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前往河内出席吊唁活动。九月五日回到北京。九月六日，周恩来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吊唁，代表毛泽东等对胡志明主席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毛泽东所献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了这句挽词。

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十周年口号》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九年九月）

—

增加了一句口号，请酌定。

二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一九六九年九月八日送审已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稿上的批语。国庆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八条，本篇二是毛泽东在第二十一条后加写的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原来的第二十二至第二

十八条依次改为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九条。九月十七日，国庆二十周年口号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 记录稿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九月）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三日报送其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谈记录稿的报告上的批语。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厅同柯西金（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举行的会谈中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二）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三条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在周恩来提出三项临时措施后，柯西金提议再加一条，即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商量。双方就上述四条达成协议，并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柯西金，当时还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周恩来总理 致柯西金的信》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晨六时送审的《周恩来总理致柯西金的信》的报告上的批语。这封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商定，主要重申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九月十一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确定的解决中苏边境冲突的四条临时措施，又增加一条：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在这一信发出后，看柯西金如何回答，再定政府声明何日发表。”九月十八日，这封信发出。柯西金，当时还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第十一稿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大致可以，下午谈一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送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第十一稿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九月十八日发出致柯西金的信（参见本册第471页注〔1〕——编者注）后，还未见苏方答复。但这封信是不公开的，国际国内都不知同柯西金的会谈内容，而莫斯科又放出中苏两国将在九月底进行边界谈判的空气。因此，对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必须由中国政府公开给以回答，并将我方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全部主张和边界冲突的真相给以说明，以取得主动。柯西金，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周恩来给柯西金复信稿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第十五稿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送审的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九月二十六日来信的复信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第十五稿的批语。周恩来十月六日的复信，重申此前中方提出的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五项临时措施，强调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同时，还告之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的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名单，并指出：关于互派大使问题，中国正在物色人选，欢迎苏联先行派出；对于苏联政府今年六月十三日的声明，中国方面即将以中国政府声明和外交部文件公开答复。中国政府十月七日的声明，重申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并谴责苏联方面在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和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中国政府的声明

于当日送交苏联方面，十月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柯西金，当时还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周恩来关于发表 中苏即将举行边界谈判公报 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

同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关于发表中苏即将举行边界谈判公报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昨（十七）日在得到主席赞同发表中苏将举行边界谈判公报后，即向苏代办（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吐里扎维金——编者注）提出。当晚苏方交来另一新闻稿，企图将谈判范围扩大。经考虑，我方拟于今（十八）日下午找苏代办告以我方提议的公报稿，系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所确认的谈判范围拟出的。现在苏方另拟新闻稿，扩大了谈判范围，这就超出了代表团所负的任务。我方将根据以上理由，发表自己的公报。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指出：“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开始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谈判。”

对李六如来信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请汪^{〔2〕}酌处。——毛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李六如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来信的批语。信中说：干部疏散离京，中央决定要他去广西，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希望回老家湖南平江，有人扶持。同时希望中央早些对他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李六如，一九二一年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在湖南平江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农民武装，参加秋收暴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何叔衡，一九二一年七月和毛泽东以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赴上海途中，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时牺牲。

〔2〕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 解放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满怀胜利的豪情欢庆祖国解放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向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五年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拿起武器，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经过长期斗争，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占领者，解放了自己的祖国。这是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

解放二十五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和捣乱，捍卫了祖国的独立，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江山。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化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阿尔巴尼亚人民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支援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一座坚强堡垒。

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以自己光辉的革命实践，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两党、两国政府、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经历了暴风骤雨的考验。中阿友谊的不断发展，必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当前，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管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如何疯狂挣扎，都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让我们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紧密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 泽 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 恩 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 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站在抗美斗争最前线的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九年来，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光荣的旗帜下，团结一心，不畏强暴，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陷入了孤立和困难的境地。越南南方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完成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虽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它还没有最后失败。尼克松^{〔1〕}政府上台后，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它口头上侈谈“和平”，宣传要从越南南方逐步撤出美军，借以欺骗美国人民，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即加强伪军和傀儡政权的办法，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证明，尼克松政府的侵越政策，和他的前任约翰逊^{〔2〕}政府并无区别，而是一脉

相承的。不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妄图永远霸占南越、分割越南的狂妄野心的。

我们相信，久经锻炼的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下，遵循胡志明^{〔3〕}主席的遗训，发扬“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持久制胜，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2〕约翰逊，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一月任美国总统。

〔3〕胡志明，原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逝世。

对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 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 的通知的批语^{〔1〕}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送审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的通知的批语。通知指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以及有关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记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分。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各省、市、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本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

对《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纪要》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一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的批语。纪要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六九年战备工作，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全军的战备情况，认为自珍宝岛事件后，特别是毛主席发出“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后，全军的战备工作进展比较快，“三北”地区准备打仗的思想弯子基本上转过来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全军战备工作会议期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军队不要松劲”、林副主席“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后，国庆节前后又进行了两次紧急疏散，进一步推动了战备工作落实。会议还交流了各军区、海空军特别是沈阳军区在战备思想教育、战备训练、人民防空、民兵工作、后勤战备和三线建设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并且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一九七〇年的战备工作任务：（一）从各方面做好防止

敌人突然袭击的准备，加强战略侦察；（二）继续抓紧部队的思想建设；（三）加强组织建设；（四）加速战场建设；（五）加紧战备训练；（六）继续开展人民防空工作；（七）加紧进行三线建设和军工生产。

对外交部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 指示电和中方代表发言稿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一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送审的外交部关于在华沙举行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给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指示电和中方代表发言稿的批语。指示电说：这次会谈，我们的方针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牌。在发言中既要掌握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不要把话说死，有继续商谈的余地。发言稿中说：大使先生在八日的声明中提出美国政府愿意同我国“扩大交流”和“扩大对话”，但是只字未提台湾问题。我们必须指出，中美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争端，其关键就在于台湾问题。一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并举行第一三五次会谈。三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决定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

关于江青不必担任北京五七艺术 学校名誉校长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一月）

江青不必任名誉校长。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关于筹办五七艺术学校给毛泽东等的信上的批语。信中说：“根据江青同志送来的两份信件，昨（二十一）日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进行了商谈。江青同志并说明，现在筹办中的五七艺术学校拟设在北京，以原劳动大学作校址，附近有农田四百多亩，可兼习农业劳动。同时，还拟在上海筹办一个上海五七艺术学校。”“北京五七艺术学校的组织机构、学科学制、招生计划和领导成员，拟同意两份报告中所提意见。妥否，请主席予以批示。”周恩来随信附送的两封信件是：于会泳等一月二十日提出筹办北京、上海两处五七艺术学校的建议，和五七艺术学校临时筹委会一月二十一日关于艺校领导班子成员配备情况的报告。临时筹委会的报告提议，江青为北京五七艺术学校荣誉校长，谢富治为荣誉政委，于会泳为校长。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于会泳，当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主管上海

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等的创作与评论。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在康生转陈垣来信的 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一月）

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转报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来信的报告上的批语。康生在报告中说：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存留，以照顾他的生活。

对参加尼泊尔王太子 婚礼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一月）

可以照总理设想作出访安排。但究应如何安排，请中央酌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七日报送外交部一月二十六日关于尼泊尔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尼泊尔王太子二月底婚礼一事的请示报告的批语。请示报告建议，由郭沫若副委员长作为特使代表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前往尼泊尔参加婚礼。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上写道：“考虑再三似以请郭老为特使致贺较妥。”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九日，中国特使郭沫若访问尼泊尔，参加王太子比兰德拉和艾什瓦尔雅公主的婚礼。

对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一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批语。指示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四）要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

同意印发批判王明投降主义 的讲话大纲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二月四日）

康生同志：

此件可以照你的意见办理。其中颂圣写成烦圣，请改正。

毛 泽 东

一九七〇年二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的是否可印发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的请示报告上。请示报告说：“去年编毛选五卷时，我记起在一九四一年政治局九月会议时主席曾写了一个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政治局会议上，我报告了这件事，各同志听说有这样一个大纲，一致要求印几份给政治局同志们看看。”“现在排了一份清样，送主席审阅，并请示是否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一阅，希望得到主席的批准。”在这个讲话大纲中，毛泽东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倾向，曾写道：“不知迫蒋只知颂圣，提不出任务”；“不作阶级分析，全无列宁精神”；“群众原则，又妥协又斗争原则”。康

生送审的这个讲话大纲，将其中的“颂圣”印成“烦圣”。毛泽东审阅时作了改正。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不久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五年八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王明一九五六年一月去苏联，此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三月在莫斯科病故。

对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二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一九七〇年二月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的批语。通知指出：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此，中央重申：（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的非生产性建筑、生活设施必须从简。（四）一切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等，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电影，不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此铺张浪费。（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二月五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并附发西安市、柳州市等地铺张浪费、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的材料。

对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 座谈会的通知》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二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康生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的通知》的批语。通知说：中央决定于二月下旬召开一次整党建党座谈会，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有关指示，推广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研究“吐故纳新”政策，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通知稿中附有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郭玉峰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当前各地整党建党情况报告》。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通知。三月十四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日期的通知》，决定三月十六日正式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北京六厂二校，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关于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三月）

照总理意见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理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送审铁道部军管会二月二十六日关于湘黔铁路方案比选情况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经铁道部仔细研究和比较，并经过踏勘和审查资料，又征求湖南、贵州两省革委会和军区意见，均认为“贵阳接轨方案”较“遵义接轨方案”为好。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亦同意这个方案。

对设立国务院文化组 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

同意。

三月十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关于设立国务院文化组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昨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一）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文化组，管理有关文艺、电影、出版、图书、博物等方面的工作。（二）文化组的思想政治领导属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分工归中央文革；文化组的行政领导属国务院，党中央对该组的指示和决定，由国务院组织实施。（三）文化组设组长、副组长和组员若干人，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四）文化组设一小的工作机构。一九七〇年六月，文化部被撤销，国务院文化组成立，组长吴德，副组长刘贤权、于会泳，负责管理文艺、电影等工作。陈伯达、康生，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德，当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五日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

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刘贤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石少华,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学会主席。于会泳,当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主管上海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等的创作与评论。

对周恩来关于筹备召开四届 人大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四日）

同意中央的部署。

三月十四日下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四日晨五时关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汪东兴回京后，传达主席关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指示（当时毛泽东在武汉——编者注），政治局在京同志一致拥护，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分几个方面：（一）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现起草好了一个决定稿，并作了修改，十三日晚已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讨论通过。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有些不便写入这个文件的，拟与各省来京同志面谈。周恩来送审的决定稿包括四届人大的指导思想 and 四届人大代表的条件、名额、比例、选举方法等五个部分。（二）关于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已由康生等五人组成，拟在三天后将修改要点写出，待讨论、送审后再着手修改文字，准备一个月完成这项工作。（三）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拟在各

地同志来京协商后，再组织人动手起草。（四）关于筹备工作，待汪东兴回程时再请他面报。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关于修改宪法等问题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三月）

同意第一项所提修改问题的意见。同时请各地方提修改意见。附件^{〔2〕}留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关于修改宪法和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安排等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三月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项工作。第一项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现呈上请主席审阅后予以批示，以便着手修改。第二项通过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来京协商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负责人名单。

〔2〕 附件，指周恩来送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和《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比例的协商方案》。

在关于迎接西哈努克 到中国访问和处理柬埔寨国内 发生政变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日）

照办。

三月二十日下午四时半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日七时关于迎接西哈努克到中国访问和处理柬埔寨国内发生政变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西哈努克向我提出，要求以元首身份向柬埔寨广播，不承认他被废黜。拟同意他由柬大使馆出面，接见中外新闻记者，散发西哈努克书面声明，很快就会被外国记者电传出去，然后我再在广播电台转播，看看各国反应。这个做法，就要准备中国驻金边使馆被砸，进步华侨被捕。兹事体大，必须请示主席，请予批告。附送的外交部电报说：西哈努克表示，如果对中苏没有不方便的话，他想留在中国或苏联，号召柬人民起来反对叛国集团。二十三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向中外新闻界发表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宣布成立

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担负解放祖国、同美帝作斗争、战胜敌人后重建国家的基本使命。西哈努克，当时任柬埔寨国家元首。

关于中美会谈日期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总理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中美会谈日期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美国“由于中东紧张、柬埔寨政变、美苏紧张而我们又直接提出要其来京谈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弄得它不好回答，又不便在三月间约见，故迟至三月二十三日提出四月初会谈”。“可以料知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它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所以先有叶海亚转达准备开辟直接渠道的谈话，后有美使馆在四月初会谈的通知。”为此，“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既在中国总理访朝之后，又在美苏核会谈（四月中）之前。这种想法，不知妥否，请主席批示”。“对叶海亚转达的口信，拟在下次中美会谈后，再予答复。”叶海亚转达的口信，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转达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口信。口信的内容是：“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

对《中央工作会议纪要》等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同意。

三月二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纪要》、会议文件以及四届人大军队代表名额分配的协商方案等的批语。会议纪要说：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召集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一致拥护毛主席三月八日关于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并修改宪法的指示，修改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比例的协商方案》、《关于四届人大三千五百名代表分配的调整方案》和《关于第四届全国人大军队代表名额分配的协商方案》。同时，会议对修改宪法问题作了初步讨论，要求各单位回去后进一步讨论，提出原则性的新的修改意见，于三月底前报中央。

对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 问题通知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三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通知的批语。通知的主要内容有四条：（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与‘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

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倒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这个组织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此案不久即查清处理。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因为情况混乱不清，清查工作最后不了了之。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

为献给斯特朗的花圈写挽词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

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女士

根据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从一九二五年起多次访问中国。一九四六年第五次来中国时访问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枣园会见她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一九五八年九月第六次到中国，并定居北京。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毛泽东所献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了这句挽词。

对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文章 《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一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2〕}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3〕}，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毛 泽 东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因为删掉几段，注脚的号码请重新排一下。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

坦—考茨基^{〔4〕}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5〕}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老沙皇的“斯拉夫帝国”早已成为泡影，沙皇统治本身，在一九一七年，早被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消灭了，老沙皇的统治完蛋了。在今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新沙皇妄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也只能是一场迷梦。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送审的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而写的《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三月三十一日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毛泽东审阅时，把文章标题改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个修改稿的批语。四月四日，陈伯达致信周恩来、康生说：“主席的批评很对，这方面的缺点主要是我负责的。请考虑在中央范围内，先开一次会，学习和研究主席的批评，以便引起宣传工作的改进。”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修改稿中加写的两段文字。本篇三是毛泽东对修

改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文章，后来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分别在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五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旗》杂志总编辑。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合称。

〔3〕删掉了几段，毛泽东在《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三月三十一日修改稿）上删去八段文字。在第一、二页，删去以下一段文字：“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许多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有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列宁有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在第二、三页，删去以下四段文字：（一）“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二）“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四）“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节节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激烈。

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洞察到现代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一次又一次击退现代修正主义的逆流，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第五页，删去以下三段文字：（一）“毛泽东同志还精辟地指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言丧邦。’”（二）“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兴邦、丧邦，就是指的社会主义之邦。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三）“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4〕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一八九六年十月至一八九八年六月，在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一九〇二年起，多次任国会议员。考茨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二国际理论家。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转向改良主义。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多次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

国际的大会，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从一九一〇年起，公开转向中派主义。一九一七年四月，参与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任外交部副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5〕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被先后解除这两个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对周恩来在朝方欢迎宴会上 讲话稿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

照办。此件基调很好。只是个别用词和个别段落，恐怕对方难于接受。^{〔2〕}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送审的赴朝鲜访问时在朝方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这次访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它对苏修闹点独立性，号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及其走狗的斗争，以形成远东的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而孤立苏修的局面。本着这个方针，起草了一个宴会讲话作为主调，不知能用否。

〔2〕周恩来在朝方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中指出：“美日反动派的狂妄企图，遭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的坚决反对，也遭到了日本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但是，社会帝国主义却站在同各国人民截然相反的立场上，积极拉拢和勾结日本反动派，同佐藤反动政府明来暗往，打得火热，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毛泽东在这段话旁画了一条竖线。根据毛泽东的批语

所提意见，在这段讲话稿中删去第一句话末尾“坚决反对”之后的第二句话。佐藤，指佐藤荣作，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关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一日，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泽东再担任国家主席。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多数政治局委员赞成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的由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的这个材料时批示：“照发。”

对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晨七时关于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我国以三级火箭试放第一颗卫星，早在一九六八年初得到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直到今春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三月底，运载火箭和卫星已运至基地，经检查测试，认为可行。四月中旬在京开会，经各方论证，认为可以发射。目前火箭和卫星已在发射阵地竖起，经检查测试，对发现的问题均已解决。现拟同意于今夜发射，请主席批示。周恩来还报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四月二十三日请示发射的报告。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对关于散发西哈努克谴责 尼克松声明请示报告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五月三日）

照办。不须开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五月三日送审的关于散发西哈努克谴责尼克松声明的请示报告的批语。请示报告说：西哈努克已将他谴责尼克松的声明写好交我们替他向各国记者散发，并于明日登报广播。经与外交部领导小组商谈，拟按主席批准的预定方针，准备下列数事：（一）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一个谴责尼克松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印支战争和支持西哈努克及南北越政府（指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编者注）声明的声明。（二）准备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宣布纲领和成立政府时，立即予以承认并致贺信。（三）准备撤退我驻金边使馆人员和专家。（四）关于援助印支三国物资，拟请越、老、柬各派代表在京协商运输问题。上述各项，主席如认为可行或需有所增改，均请主席约集在京政治局同志一议。五月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 and 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和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行动，对西哈努克

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五月五日，中国政府声明在《人民日报》发表。西哈努克，当时任柬埔寨国家元首。

对《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 下乡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五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五月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提出：各级党的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十分重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把它摆到重要位置上来。社、队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要认真解决插队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必须确实用在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上面。建议各地普遍检查一次知识青年下乡的工作，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作出规划。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2〕}，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3〕}，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4〕}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

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根据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所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通称“五二〇声明”）。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等

给毛泽东的报告说：“声明稿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几位同志起草，在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要突出主席同黎笋同志谈话中的思想。”毛泽东审阅时批示：“照办”。五月二十一日，这个声明由林彪在北京举行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上宣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黎笋，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2〕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当时的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和柬埔寨王国第一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之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国家权力落入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3〕联合声明，指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后发表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4〕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 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五月）

—

湖北试点经验，似可转发各省参考。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二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报告》的批语。报告说：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我们从去年六月开始抓了武重、武锅、武船、武钢机总厂、国棉一厂、二汽、武大等六厂一校。除二汽外，这几个单位都是武汉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抓点前，其中五个工厂斗、批、改搞不下去，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军宣队进驻各点

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政治建厂、建校的道路，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中央各项号召，团结、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孤立、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改变了这些单位过去“老大难”的面貌。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常委亲自抓。（二）学习、落实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三）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四）建设军宣队。本篇二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送审的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报告》指示的批语。指示要求各省、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在阅读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后，把各自的试点经验也写一份总结报告给中央。如未试点，可以参照北京六厂二校和湖北六厂一校的经验，进行试点和点面结合，以利推广。武汉军区党委报告中提到的武重、武锅、武船、武钢机总厂、国棉一厂、二汽、武大，是六个企业和一所学校的简称，分别指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钢铁公司机械总厂、武汉第一棉纺织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和武汉大学。北京六厂二校，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报告》。

对转发北京二七机车厂、 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 报告的指示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五月）

照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转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关于北京二七机车厂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和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四月二日关于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的指示的批语。两个报告强调，整党建党要“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搞好吐故纳新”，“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整党建党”。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个报告。

对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的批语^{〔1〕}

（一九七〇年五月）

照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的批语。指示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具体要求是：（一）努力增加生产。（二）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形成生产能力。（三）大搞综合利用。（四）提高劳动生产率。（五）大力降低消耗定额。（六）提高运输效率。（七）提高产品质量。（八）改善经营管理。（九）大抓清仓查库，注意修旧利废，节约代用。（十）上述各点主要是讲工业战线，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他各条战线。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

19

1967.3

1970.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欢迎关注中央文献出版社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网址: <http://www.zywxpress.com>

微信公众号: zywx5073

ISBN 978-7-5073-4985-6



9 787507 349856 >

定价: 1500.00元 (全二十册)